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每份售六千元·

第三卷 第十七期

專論

一個歷史的教訓 吳恩裕
論這次的大選 樓邦彥
論發展學術的計劃 陳序經

外論選譯

歐洲完了嗎？ 拉斯基

生活與文化

論保長 胡慶鈞

觀察通信

蔣主席抵平後的北方政軍（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共軍入川之勢（西安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武大自治會普選記（武昌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秀才遇着兵（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人物及事業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余才友

文藝

談詩歌的晦澀 戴鎦齡

編者報告 編者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羣

·撰稿人·

編者報告

我們從上期起，售價加了一千元，每册售六千元，但是這一點增加的收入，遠抵不上日益澎大的支出負担。白報紙本星期一又跳到一百五十萬一令；物價這樣躍跳，我們體念前途，眞是不勝惶恐。收入無法增加，而支出不斷加重，因之我們不得不在各種開支方面，盡量節省。

廣告

我們本來每期出版時，在大公報封面刊載廣告一天。最初是十五行，後來減至十二行，十行，甚至八行；這也可以反映雜誌業處境的困難。最近我們連封面地位都感覺負担太重，已將每期廣告移封大公報教育版的下面。這樣一個月可節省二百多萬元。

退稿請附信封及郵票

我們過去來稿不用，一律退還。雖然曾經請求投稿人附足退件郵資，但事實上，我們爲顧到投稿人的心血，即使沒有附郵的・來稿如其不用，我們也仍然是退還的。但是最近郵資加價，一封平信已要二千元，航平要三千元，掛號要五千元；稿子都比信重，所貼郵資常須加重，再加上退稿用的信封，大約每退一稿，須費六千元至八千元，照我們過去的經驗，每一個月平均退回的稿子，大概在三百件以上，一個月退稿所用的郵資及信封，至少總在二百萬元至三百萬元。我們希望能夠節省這一部分的支出，所以自明年一月起，所有投稿，如於不用時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以便照退。

希望定戶寄還信袋

關於直接定戶寄刊所用的大信袋，照上月份的市價，已經合到一千二百元一個，照最近的紙價，恐又不止此數。這是一筆極大的負担。有些刊物寄刊時，都用舊報紙包捲，但我們覺得這樣的包寄，定戶於拆閱時，易將刊物拆破，而且捲過之後・刊物皺紋很多，不易保存。我們爲顧全定戶的利益起見，所以不惜工本，採用信袋，並用牛皮紙印製，避免裂爛。但牛皮紙實在太貴了，我們現在決定，遠地郵政周折很多的地方，仍用牛皮紙信袋，近處郵政簡捷的地方，將改用白報紙信袋，以資節省。同時定戶若能于拆閱時，小心拆閱，不使破裂，積有數份，仍能寄還本社，以便再用者，最爲感激。這也可以幫助國家減少紙張的浪費。

停止贈閱(自三卷十九期起)

我們出版以來，承蒙許多前輩朋友鼓勵支持，並給種種幫忙，非常感激。我們曾按期寄贈，藉請教益。一年半來，這方面的負担，亦屬可觀。現在我們每期贈閱的數目，約爲二百五十份(包括股東，撰稿人等)，即照目前售價計算，再連郵票及信袋，每份約須八千元。這就是說，每期贈刊的負担爲二百萬元，一個月爲八百萬元，一年需負担九千萬元左右。這個負担實在太重了，所以自明年一月份起，(即三卷十九期起)，我們不得不盡量減少贈刊，以資撙節，俾這一部分負担，不致轉嫁到一般讀者的頭上。務請原有受贈的先生們體諒。

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暫停兩個月

我們除了盡量顧到讀者的利益外，對予作者的利益，我們素來也是十分關切的。一方面我們隨時調整稿費率，一方面實行「文到即奉」的辦法。關于稿費的調整，過去十六個月中，已調整了十次，自千字四千元增到千字十萬元。自明年一月起，將再提高到千字十萬元至十二萬元。這也足以表示：我們一方面在開支方面盡力撙節，一方面在必要的支出上，應當增加的還是增加。但關于「文到即奉」的辦法，在三十七年二月以前，暫行停止兩個月。在三十七年二月以前，我們將改用「發表後再奉」的辦法。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我們最近有一筆很大的支出，「頭寸」驟然之間緊得利害，所以稿費支付的辦法，須稍改變，但希望自三十七年三月份起，仍可回復採用「文到即奉」的辦法，這一點務請惠稿的先生們體諒。

售價或將再加・訂閱務請從速

照目前的物價情形，本刊自一月份起恐怕還要加價。讀者如欲避免漲價，希望早日訂閱，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關于訂閱，我們順便向讀者說明，務請直接向本社定閱。因爲我們直接定戶的刊物，都是在星期五上午付郵的。讀者如向他處間接定閱，則至少要在星期六上午付郵。同時向他處間接定閱，收費總要比我們多收一點，所以以向本社直接定閱，最迅速，亦最經濟。

合訂本現在每册仍售六萬五千元，自一月份起，售價將要提高。希望保存本刊合訂本的讀者，早購爲是。

投書惠函務請註明眞實姓名

我們順便在此報告一點，即希望讀者投書或賜函，務請註明眞實姓名及通信地址。有許多讀者都不署眞姓名，或者我們以爲是眞姓名，可是一經去信，便原函退回，說是「查無此人」，或「無此門牌」。我們一向的態度是要求大家說話負責任，所以本刊傳統，例不刊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投書雖與論文不同，但至少應對編者負責，讓編者知道投書人的姓名地址。假如連這一點責任都不負，則投書人還有什麼權利要求我們發表他的意見。中國人一般的缺點是鬼鬼祟祟，自己躲在後面，不堂堂皇皇的挺出來，一切災禍都希望由別人來担當。例如有許多讀者投書時，常常這樣說：假如我們不登他這封信，就表示我們不公正，不勇敢。但是這位讀者自己連一個姓名地址都不附，逍遙自在，一切乾淨。我們認爲這種態度是不公道的。而且有時我們收到讀者的投書或信件，無法作覆。我們希望以後讀者無論是投稿，投書，或者給編者個人通信，務請註明地址，以便必要時可以函覆請敎。(編者)

定戶公鑒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航掛需五千一百二十元，航平需二千一百二十元，掛號需三千一百二十元，平寄需一百二十元。其中以航掛及掛號郵資增加尤多。

凡用航掛及掛號寄刊的訂戶(照本期所刊訂閱辦法訂閱者在外)請速補擲郵資。(自三卷十六期起每期補二千二百元)以便照常寄奉。否則本社將扣寄刊，不再另函通知。(訂戶課啓)

廣州中流出版社鑒

廣州昌興街四十一號中流出版社鑒：尊處每次來函，謂款即匯滬，囑本社繼續寄刊。但尊款始終未到。其後一再函催，前後數月，隻字不覆，如此行爲，跡近欺騙，至爲遺憾。即請將所有欠結，迅即擲還，以淸賬目，以維同業信譽爲荷。

(批發課)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平寄六萬五千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九萬元　航掛12萬五千元
半年(廿四期)：平寄十三萬元　掛號二十萬元　航平十八萬元　航掛廿五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寄平美金三元(半年)美金六元(全年)
零售各期一律照最近期訂價(每册六千元)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七期
卅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期作者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陳序經：南開大學教務長
胡慶鈞：清華大學教員
余才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戴鎦齡：武漢大學教授

一個歷史的教訓

吳恩裕

本文所講到的「歷史的教訓」，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如不平等政治必難安定。哲學家儘可以雄辯地否認歷史能給我們「教訓」，但歷史時時在教訓着我們，却是人人可以經驗得到的事實。我們試先舉例證明上述這個原則，然後再進一步探求：既有此種歷史的教訓，我們應該怎樣接受這種教訓，而對實際政治有所改革。

我們先就古代希臘城市國家的社會說。城市國家的社會，便是一個經濟不平等的社會。希臘的公民階級，不事生產，而享受一切特權，並有充裕的時間從事文化、美術、哲學、音樂種種高尚的活動。另外有一種奴隸階級，則專以血汗勞力來從事生產工作，供應公民階級，因而公民階級纔能有餘暇從事政治文化活動。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奴隸階級支持了整個希臘社會的存在。然而在希臘社會中，他們却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甚至連做「人」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這該是多麼大的一個不平！這不平能維持多久嗎？不能！希臘城市國家當時黨爭之烈，可爲明證。希臘社會中的黨派之爭，骨子裏是貧富兩階級的鬥爭。這種貧富之間極度不平的情況，是不會長久維持的。柏拉圖對於這種貧富不甚的現象，曾有慨歎，認爲每個城市國家都分裂爲一「貧人之國」與一「富人之國」了！然而，他並沒有切合實際的補救方策。亞里士多德曾經替這貧富之爭，開了一個混合憲法的藥方；並且希望用中產階級來平衡貧富兩階級的勢力。但是，即使眞的實現了亞里士多德的混合憲法，也不會獲得他所想像的平衡；因爲中產階級根本就是動盪不定的，可進可退的。而在事實上，希臘的社會終於崩潰了。可見這乃是歷史的教訓：若不根除人們間經濟上的不平等，政治是不會安定的。

再以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爲例。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也存在着一個絕大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按着近代經濟理論，工資勞動者，是資本主義造成的，它們產生了以後，便逐步加緊地在這種制度之下，被剝削着，被壓迫着。他們那種：工資菲薄不能自治；工時加長，不能勝任；失業無告，痛苦呻吟，的生活情況，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中的主角資本家負歷史責任的。勞動者對於社會的服役大，而報酬少；至於資本家，我們即使不能說他們沒有服役，至少也是服役小，而報酬多。這種對比，實在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內在的矛盾，而這矛盾就正是一個絕大的不平。

固然近代社會中的勞動者，並沒有像希臘社會的奴隸一樣，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法律的權利；但是由於社會經濟情況的壓迫，使他們不能實際享受這那種權利，却是明顯的事實。列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法律上規定着人人都有財產權利。但在沒有充分能力來享受這種權利的勞動者看來，這種權利祇是一個諷刺。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近代工資勞動者，却是用勞力、血汗來支持現代社會的人。任何社會都得用生產品來維持它的物質存在；製造那些生產品的人們，就正是那些工資勞動者。沒有他們，這社會就不能維持其物質的存在；失掉了物質的存在，也就是不能生存。由此可見：工資勞動者，實在是支撐資本主義社會的要角。「勞動」乃是社會的支撐者。然而，這種服役最大的人大多數人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正是收入最少、生活無着、像達爾文形容動物界的情形一樣，從事「生存競爭」的人們。可是這種不平等能長久延續下去嗎？不會的！雖然表現的方式不同，但各國都有這個問題，而且這問題在每個國家都急切地逼迫着現實解答。否認它，固然是愚蠢；忽視它，也惟有自誤。我們希望各國的遠見政治家，都

正視這個問題，並求良法，以謀解決。方法倒並不一定。蘇聯的方法，固然是一種辦法，英國工黨的方法，也是一種辦法。我的意思是：必須有一種辦法。

以上兩個例證，一個是過去希臘的史事，一個是近代當代的經驗。事實雖然是不同的，但是它們給我們的教訓却是一樣的。這教訓便是：經濟如不平等政治必難安定！我們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也必須接受這種教訓。

我們決不能再走上歐美資本主義的老路，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地上，眞正的民主政治是不會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少數人獲得利潤；而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大衆享受物質的福利。因此兩者根本是衝突的。惟其如此，所以，在資本主義背景中的民主政治下的目標如「自由」和「平等」等，都不是眞正的自由和平等。在這種社會中，平等是根本找不到的事實，我們祇有在法律條文上，能看到「平等」的名詞而已。同時，在這種社會中的自由，也祇是少數階級的特權，大多數人並不能享受。在中國社會中，已經有了地主與農民，官僚資本家與平民等等的不平等，若再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則必將又增加工業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不平等。前鑑不遠，我們當然不能再走這條路。

可是，反對走上資本主義，並不是反對工業化、現代化。因爲資本主義是一種生產方法：凡是生產方法都是有兩種特質。一是生產的技術問題；二是生產的分配問題。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反對其私有財產制度，而並非反對其生產的技術。因此，祇若有更公道的分配方法，我們當然可以用最進步的技術從事於生產工作。這樣，我們也會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路途。這是唯一既能達到工業化或現代化而又沒有經濟上不平等的辦法。

就中國人的理論言，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趨向於這條路的。中國現在國民黨是唯一掌握實際政權的政黨。如果他們忠於謀國，他們應該考慮到這個歷史的教訓；經濟如不平等政治必難安定！如果他們忠於黨的信條，他們應該趕快實施中山先生上述兩種政策。

論這次的大選

樓邦彥

幾個月前，我曾在「動員，戡亂，行憲」一文內（「觀察」三卷一期），強調政府要是有行憲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暫不作行憲的打算；我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廣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刼，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任何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憲政的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憲』。」至今我的看法依舊如此，並且更爲加強，因爲近來又有更多的事實，證實我這種看法並無錯誤。

很多人一致認爲行憲總比不行憲強，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因爲他們覺得民主雖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得一步一步地學習，那麼今年的大選年正是我們學習民主的開始。他們的出發點顯示他們是怯懦的，他們的立論顯示他們是錯誤的。何以他們是怯懦的呢？因爲他們逃避對於現實作一番認識，他們不敢想我們當前尚有一個根本問題有待解決，或者從不認爲這是一個先決的根本問題。我們在對日作戰的時候，曾經在八年中不斷高喊過「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傳奇式的口號，這在一個原來在各方面都已經很上軌道的國家將會成爲一種奇蹟，而在我們這一個破爛的國家，不敢作何妄想的老實人必會默默相對，作過會心的微笑，因爲事實擺在我們面前。勝利之神冷不防地降臨得那樣突然，我們在慘勝之餘，恍然發覺我們不但沒有開始建國的工作，連一個像樣的計劃都拿不出來，却又要緊跟着去接管敵人在作戰期間所做了的偉大建設，而尤其慘的，這樣偉大建設的大部份，兩年來一直在聽其荒廢腐蝕，或燬於內戰的炮火。「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現在已毋須再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口號：「一面戡亂，一面行憲」。由於過去的抗戰慘勝和建國無成的教訓，我們對於戡亂和行憲的前途，也不能不有幻滅之感。我們不禁要問：鑒於目前的局勢，亂能戡得了麼？亂戡不了的話，憲能行得成麼？即使亂能戡得了的話，憲又能行得成麼？行成的憲將是甚麼樣的一種憲呢？這是今天所有的問題中之必須先決者，但是那些人却避而不顧；如此逃避現實而說要學習民主，我祇能稱他們是懦夫。

何以又說他們的立論是錯誤的呢？那些人似乎有一個基本的假定，這個假定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民主的條件多已具備，所缺少的祇是「東風」，「東風」就是能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因此他們主張行憲，贊成選舉，因爲在舉辦選舉和行憲的過程中，人民可以逐漸懂得他們是主人翁和怎樣當主人翁，一俟主人翁能站得起來的時候，民主的理想園地也就到達了。這與國民黨訓政的主張是基於同一的理論基礎，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中有一段話最能表達訓政的精神：「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旣產生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爲其全部之根本精神。」就重心放在人民身上這一點來說，訓政也好，學習民主也好，實在是異曲而同工。其實政治權利的行使是最簡單不過的一件事情，與其說重要的在如何行使政治權利，毋寧說關鍵是在行使政治權利的環境和情緒，環境是民主的客觀條件，情緒是民主的主觀條件。當今天大規模的戰亂正在擴展的時候，我們絕對談不到太平時期的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內戰的事實一天存在，民主的客觀條件便一天不能具備，這是太顯然的事了。至於講到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情緒，這又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今天除掉官僚和資本家以外，社會的各階層都在趨向沒落中，吃飽穿暖已感不易，那裏再有情緒去對投票發生興趣。更何況在這一二十年中，一般人民所感受到的儘是些貪污、迫害、暴力……一類的惡行，他們早已一個個進入了麻木狀態，除非他們能够自發地去爭取他們應得的社會地位，他們對於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絕不會感到是一種刺激。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業已普遍地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感覺：對於大部份麻木了的老百姓，民主也好，選舉也好，一概視爲似同抽丁徵糧等一樣的不可抗拒的遭遇；對於另一部份頭腦尙清醒的人民，則民主和選舉便變成了一種極其可笑的騙局。如果我們承認民主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目前都不存在，而那些好心腸的人還在以學習民主來替正在進行中的民主騙局辯護，我祇能說他們是過於天眞了。

說到此次大選本身，我們從報紙上已經可以知道層出無窮的畸形現象，我覺得在普遍腐敗貪污的氣氛裏，選舉的利誘、操縱、威脅等情事的發生原爲意料中事，無可足道。我祇想在這裏提出那些活躍的政客們在光天白日下公開地所幹的幾件事情，願意我們大家在那些把戲中警覺這不是選舉，乃是分贓，這不是學習民主，乃是被騙使利用。

選舉的先決條件有二：一是不同集團的競爭，一是不同主張的辯護。先說第一個先決條件。國民黨爲要履行還政於民的諾言，一方面加緊戡平共產黨的叛亂，並解散否認「憲法」的民主同盟，另方面又捧出了誠意合作準備粉墨登場的靑年黨和民社黨，於是表面上我們便至少有了三個政黨了。然而這三個政黨實際上並不是三個獨立的個體。假如此次大選稱得上有競選，那是三黨的聯合競選，換言之，除掉個別的無黨無派份子以及個別活動的國民黨黨員外，再也沒有與政府相對立的政治集團了。在選舉以前，我們便已聽說靑年民社兩黨由要求保證候選而進一步要求保證當選，在選區的分配以及名額的確定方面會爭得耳紅面赤，一則說大選提名如不獲協議，即將退出政府，再則說國民黨專政已二十年，我們何必一定參加政府。這怎不令人啼笑皆非？能保證當選是說明了國民黨在選舉時的神通廣大，要求保證候選是證實了靑年民社兩黨甘作國民黨的尾巴，猶似一九三一年以後英國的國民工黨(National Labour)和國民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是保守黨的尾巴一般。靑年黨總部於大選前夕發出下列一個通告，它是此次大選的重要文獻之一：

「本黨參加此次大選，應與國民黨民社黨切實合作。國民黨中央黨部已通知各地協助本黨同志競選，本黨各級黨部負責人，應即與該地國民黨負責人切取聯絡共策競選互助事宜。其在國民黨提有候選人之地方，本黨同志應竭力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其在本黨與國民黨並提候選人之地方，本黨同志應充分發揮民主作風，作和平合法之競選，凡此原則，並完全適用於對民社黨。」

從這裏我們可以確定三黨的競選聯合陣綫。但是由於非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的活躍情形，投票結果並不如預期那樣滿意，民社黨候選人金侯城在上海的落選，尤使張君勱大發牢騷，說是靑年黨陳啓天當選，而金侯城落選，顯爲厚於此黨薄於彼黨，那是竊盜民主，違反民意。其實這那裏又是民主或民意的問題，乃是分贓不勻的氣話；國民黨旣能如意地厚此而薄彼，選舉不就是多此一舉麼？所以我說張君勱這一氣，把三黨協議的馬腳全都露出來了。此其一。

再說第二個先決條件。國民黨的還政於民的諾言原爲一個了不起的理想，現在證明這個理想原來是幻想，我們因此更相信了凡是獲得權力者是絕不會輕易放棄其權力的。國民黨二十年的執政，自然有功也有過，現在要還政於民了，在大選時却聽不到任何有關失敗的國民黨統治的言論。大選而無反對意見，大選而無充分言論自由，這不能不說是對於民主憲政的極大諷刺，我們有選舉，但是沒有對於不同主張的辯護；老百姓投票了，但是不知道選出的人去幹甚

改「憲法」，而首屆國民大會最重要的任務當然是選舉總統副總統，則候選人似乎應該在競選時提出他們對總統副總統人選的主張，要不然光是拉攏、宴客、汽車接送……選舉還有甚麼意義呢？投票豈非連起鬨都不如呢？近代的選舉，尤其在政黨政治相當確立以後，其對象應該是政黨和政策，而非候選人個人；是則即使要有學習民主那麼一回事，也應該是讓人民學習怎樣選擇政黨和怎樣瞭解政策，絕非讓人民學習怎樣為有錢有勢階級所驅使利用。此其二。

多少年來，不斷的戰亂災殃，已使一般人厭棄政治，恐恨政治，他們所要求的祇是吃飽穿暖，安居樂業。我們的這個時代這個國家，十足顯示了政治自由的限度和經濟安全的可貴。北平市此次大選便有一個值得深思的插曲，某郊長叫他們來領取麵粉，這是多麼逼真的一幅社會的縮影！老百姓要的是生命生活，他們終日在饑餓疾病線上掙扎，那裏再能顧得到以國民身份踏去換取選舉票？我們希望我們的政治家應該多多去體驗這現實的人生，他們如果尚有天良的話，應該立刻有所覺悟，重新選擇他們的路線，不然，社會上終有一天會產生一種力量把他們拉下來的。

今天談學習民主，除非是那些好心腸的人的夢想，否則，若引用張君勱的話來說，那簡直是竊盜民主！竊盜民主者或能欺騙得了人民，也或能蒙蔽得了某些外國，但是他們怎能欺騙蒙蔽得了他們的良心？

卅六年十二月五日北平。

論發展學術的計畫

陳序經

自胡適之先生發表他的學術獨立的談話（九月八日各報均有登載）之後，我於九月九日曾寫了一篇「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發表於九月十一日的天津大公報。此外，鄒魯先生也致函與胡適之先生，詢問所謂五大學中的中大，是指前中山大學，還是中央大學。胡適之先生為了答覆我的文與鄒先生的信，於九月十四日又發展了一篇談話。據這一天的大公報所載，其中有了下面一段的話：

> 先建設五個大學之擬議，不過為新聞記者問及時的一個私人意見，政府未必照此實行。所指中大，確為中央大學。本人並未以地域分配。東北、西北、西南，都沒有提到，並不祇華南。平時我也認為政府所耗外匯太多。如馮玉祥政府撥給六十萬美金，李漢魂考察歐美一行，達二十人之多。衛立煌大約也在國外耗費不少。資源委員會高級職員在國外的，有四百人之多。我在美國作大使數年，作旅行講演，達四百次，都是未帶一個隨員。提了皮包，自己走路，未替國家糟化一個美金。我並不是反對留學，不過是拿來與建設國內大學相比而已。

我的那篇「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主要的也是指出胡先生之提倡用政府的全力，去發展五個大學，這就是北大、清華、中大、武漢、浙江，是不見得公平。同時我又指出我雖贊成國內大學，要充實起來，然我卻反對用目前的留學的外匯，去作這件事。因為國家的外匯與錢財之浪費於其他方面，實在太多。若以此區區之數，去發展國內大學，也未見得是好辦法。胡適之先生這個談話，既聲明「先建設五個大學之擬議，不過為新聞記者問及時的一個私人意見，政府未必照此實行」，同時又並不是反對留學，而且承認政府所耗外匯於其他方面的太多。這個聲明之於我的意見，可以說是比較接近得多了。

但是，胡適之先生這個聲明，不只不能使鄒魯先生滿意，而且引起馮玉祥先生的反感，與翁文灝先生的答辯。馮玉祥先生的信，曾在十月四日的北平世界日報上登載。翁文灝先生的信，由胡適之先生發表（十月五日天津大公報）。翁先生的信裏，承認戰後資源委員會，先後派出赴美實習人員，總數確有四百人左右，雖則他也指出，今年五月以後，已令其逐漸回國。至於馮玉祥先生之指出胡先生「任意胡說」，胡先生雖也正式請中央社更正他所說的數目字的錯誤，而且表示歉意，然而據薛篤弼先生的信中說，馮玉祥先生出國，除了政府給國幣之外，政府先後給了十三萬餘美金。

平情而論，胡適之先生所舉的數目字，雖有錯誤，可是馮玉祥先生用了十三萬元美金，數目並不算小。戰後多少大學，請求政府准購外匯，以便在美國購置圖書儀器，其請求十萬或八萬美金者，據我所知道的，固未見其照准，就是請三千五千的，也未見得容易答應。馮玉祥先生並非水利專家，赴美考察水利，已使人們驚訝，而所用美金若此之易，較之一般的大學請求美金若是之難，兩相對比，我們惟有慨嘆「師道衰」而已矣。

胡適之先生雖有了上面的聲明，但是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愈來愈熱烈。除了我的文章，與上面所舉出的函件，以至胡先生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九月廿八日天津大公報）之外，天津的益世報的記者，曾訪問了平津的十多位學者，對於這個計劃的意見，發表於十月四日與五日的該報。此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之發表於各處刊物的，也有十多篇。最近在北平出版的「現代知識」，還出了一本學術獨立專刊，這都是表示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

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大致上雖已在「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以及「公論耶？私論耶？」兩篇文中說明，可是還有不少意見在那兩篇文中沒有說及，或是說及了，而却言之未盡的。我願意在這裏，再略加解釋，以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作參考。

在這一次的討論中，好多人都覺得胡適之先生所用「學術獨立」這個名詞，未甚妥當。因為學術是沒有國界的，所謂學術獨立，會變為孤立，而成為閉門造車的流弊。我以為胡先生之用了這個名詞，雖未免有了語病，但是在意義上，胡先生也並沒有這樣的想法。胡先生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一文裏也說：

>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担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我們希望中國的學術，能夠作到這個地步。所以大致上，我們也可以贊同胡適之先生這種想法。不過要想這樣的作，與其說是爭取學術獨立，不如像裘賢能先生所說，是爭取學術並立。換句話來說，我們所要爭取的是想與歐美的學術並駕齊驅，或是進一步的去駕而上之，並非獨立。而況照胡先生所舉的四個條件來看，無一不與現代世界的學術先進的國家，有了關係，而所謂「分工合作，共同担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更不允許我們去談學術「獨立」了。

假使我們不以辭害意，而同胡先生一樣的希望中國學術能與歐美並駕齊驅，或是駕而上之，那麼問題是如何始能達到這個地步了。胡適之先生說：

>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畫。在十年之內，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我們同意於胡先生所說在學術方面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們未必贊同胡先生所說，在五年或十年內，政府用全力去幫忙五個到十個大學，就能達到胡先生所希望的學術獨立。

我們知道中國之接受西學或胡先生所說的現代學術，雖然有了七八十年的歷史，但是因為我國固有的文化的惰性作祟，所謂「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以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只使中國的自然科學，落後得很，而且使中國的社會學科或人文學科，也遠不及人家。在尋求高深的智識上，大學的歷史，既不過是五十年左右，研究院的成立，更為較晚。至於圖書儀器的設備，也是簡陋不堪。再加以數十年來的政治上的波浪，與經濟上的凋零，學術的研究，當然難於進展。抗戰八年，又加以二年來的紛亂，一般的大學，固多是基礎未堅實，而在風雨飄搖之中，就是一些歷史較久的學府，像北京大學，亦何嘗不尚築在「沙灘」之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欲以政府的全力，去培植五個或十個大學，而想在五年或十年內，能夠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是否能作得到，實在是一個問題。

而況學術水準的提高，不只是靠着五個或十個大學的努力。因為一般的智識水準，以及好多的條件，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美國的學術，在現代的世界裏，不能不稱為發達，在殖民的時期，固是深受了英國的學術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以至上次歐戰，大致上又很得力於其留學生，而尤其是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的提倡。三十年來，若用胡適之先生的名詞來說，美國的學術，總可以說是獨立了，然而不少的美國權威學者，也曾指出，在應用的科學上，美國雖很發達，可是在理論的科學上，還趕不上歐洲，有一位還說美國在這一方面，至少落後五十年。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還要跟着像愛因斯坦這些人去學。美國有了三百年以上的哈佛，有了將近三百年的耶路，以至二百年的普林斯頓，與好多百餘年歷史的大學，再加上美國的安定的政治與富裕的經濟，以至近數百年來的歐洲的學術的堅實的基礎，而在學術的某一方面——也許是主要的方面，尚趕不上歐洲，那麼中國而欲在五年或十年內，發展五個或十個，成為世界上的第一流大學，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並不忘記，芝加哥大學以至加里福尼大學，在很短的時期，也能躋於

學所發展的學術風氣，而且有了美國以至歐洲的一般的智識水準。有了充份的經費，固是發展學術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只有了這個條件，是不够的。陸志韋先生說：「有人才才有儀器設備，儀器設備不能造人才」。這也許太看輕了儀器設備，然而若說只有錢財去充實儀器設備，就可以成爲第一流大學，那又未免把辦大學看得太容易了。

我以爲在我們這種大學敎育還在萌芽，與學術水準很爲落後的時境之下，假使要政府而對於高等敎育有計畫的話，在目前的中國裏，至少對於下列兩點，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一）是各大學有成績的院系，（二）是各大學的所在的區域。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著名或所謂第一流的大學，未見得樣樣都辦得很好。所以一個著名大學，其學院或學系，儘管很多，或是幾乎無所不有，然而辦得好的，往往也只是少數或一部分的院系。有的某一院或兩院，特別著名，可是不只在一院之內，往往其所著名的，也不過是一系或兩系，甚至在一系之內，往往其所著名的，也不過是一兩種科目，所以，成績卓越的大學，固往往未見得各院各系都好，而一些人們所目爲辦得不很好的大學，也未見得一定是樣樣都要不得。比方年來國人對於中山大學的批評，相當嚴厲，可是，比方我已說過，我們未必（按世紀評論二卷廿一期中所載拙作「公論耶？私論耶」漏了未必兩字）同意於朱光潛先生所說：「廣東的中山大學，雖然歷史很悠久，面積很廣大，建築物很好，但除此以外，卻沒有什麼」。我曾指出過去主持中山大學的人們，因爲只顧了政治上的地位，而忽略了辦敎育的職責，使中山大學吃了很大的虧。然而若說中山大學，除了歷史久、面積大、房子好之外，卻沒有什麼，卻是不公平之言了。中山大學的農學院，醫學院，都有其貢獻，其他的院系，也有其好學的人士。農學院的昆蟲學，有了很好的歷史，新辦的北京大學的農學院的昆蟲系，還要請了中山大學的昆蟲學的教授去幫忙。假使我們而說凡是中山大學所辦的，通通都不好，那是未免太過了。而況事實上，國內之多多少少的大學之比中山大學之辦得不好，又不知多少。所以，平心靜氣而論，假使我們對於中山大學的責備，較之別的好多大學爲甚的話，與其說中山大學辦得比別的好多大學爲不好，不如說是我們對於中山大學希望太大。中山大學，是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大學，又是革命策源地中的唯一的國立大學。在抗戰之前，所用的經費，又特別的多，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個大學，應該是國內的模範大學，應該是「世界的一個第一流的大學」。然而正是因爲大家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太大，結果是失望亦容易很大。在失望很大之餘，中山大學卻爲世人所詬病，但是事實上，願意去作了詳細考察的人，大概不致於若是之失望罷。

所謂著名的大學，既未必樣樣好，受人譏罵的大學，也未必樣樣壞。公平的辦法，是應當去鼓勵那些成績卓越的院系，使其基礎更加堅實，使能充分去自由發展。這纔是政府秉公辦理的善法。若只含混的去培植幾個大學，而一筆勾銷了其他的大學，結果是不只其他的成績卓越的院系的工作因之而停頓或退步，就是那幾個受了特殊待遇的大學，在五年或十年內，其有成績卓越的院系，既未必就成爲第一流的院系，而其新辦或一向沒有什麼成績的院系，基礎也未必能穩固。這不只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是國家的很大的損失。

不但這樣，全國各大學，大致上，既皆在萌芽的時期，政府對於各大學在地域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我國大學敎育，一向集中於平津京滬數個地方。這本來就不很合理。抗戰時期，雖有數個新立大學或不少內遷大學在西北與西南各處，可是戰後內遷的，既已遷回原來的地方，而新立的，基礎又太不穩固，結果是大學敎育還是集中於這些地方。從地域方面看起來，這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又我國交通事業一向不發達，再加以抗戰時期以至戰後的慘重的破壞，不只內地青年之考上平津京滬的大學的，不易負笈來求學，就是中部南部各處的已被取錄的青年，也難於到校。這是辜負了不少的青年，而未免失乎國家造就人才的本意。

而況學術的研究，往往有與特殊的地域，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西北考古的工作，最好是在西北的大學中發展。西南民族的研究，最好是在西南的大學推動。又如研究廣東各種方言，以至研究中國之於南洋或中國之於西洋的關係與海道的交通，最好是由在廣東或福建的大學去負担這種工作。此外，又如農學院或工學院的發展，最好是能顧及地域上的特殊性。這不過只是隨便的舉出一些例子而已。

總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國，大學敎育既在萌芽，而學術水準又很爲落後，我們對於大學敎育，假使要有計畫的話，合理的計畫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已經辦理得有成績的院系，既應該加以特別的鼓勵，而對於大學敎育的區域的特殊性，也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若只是隨便的舉出或指定五個或十個大學，希望政府能用全力去培植，而期望在五年或十年的時間，成爲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這不只是不見得公平，而且未必能做得到罷。

歐洲完了麼?

Is Europe Done for? The Nation, Nov. 22, 1947

英國拉斯基教授

這是拉斯基教授最近發表關於目前國際問題的重要論文之一，和另外二篇即將在 Nation 雜誌內發表的論文成一整套。該兩篇的題目是：「美洲橫跨世界」America Astride the World，和「蘇聯的實際」Russian Realities，我們希望也能把它們繼續譯出。（譯者）

一

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辭，它更是一個鉅大傳統和一個心靈的性格。在過去，它會見過狂風暴雨，正像現在掃蕩着它全境的一般。它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見過，又在法國革命時代見過。因此，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的大革命、它生命中最顯著的徵象是危機的感覺和危機的事實，這對於歐洲以外的人也不應引爲驚異。現在歐洲正經受了六年的大範規破壞，戰爭的蹂躪更遺留下深潛的疲乏之感。從前由於慣習的訓練，使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成規，被認爲有似一種自然義務，但也因了納粹的侵略而大部喪失。最重要的是：現在歐洲的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不僅喪失了自信，更喪失了把他們傳統價值來束縛一般民衆的力量，除非像弗朗哥西班牙地訴諸醜惡的强制方法。

今天歐洲正代表着一個文化特徵：這文化的最後基礎已發生了問題。在如此廣闊的地域上所建立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政府，足以證明一般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不滿，無論資本主義已成功了裝點上政治的民主機構的陸飾。這是歷史過程中一個眞實的轉捩點，它和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緩性變易，同樣地眞實。可是現在歐洲的危機却更爲生動和震撼，這是原因於：一、近代工業技能已使事物的變易比前更快；二、歐洲帝國主義的崩潰已剝奪了資本主義在遠東、東歐、和東南歐，繼續維持其地位的機會——它已不再能使大衆人民付出代價以維護原來統治者的傳統特權。

祇當美國能給予歐洲統治階級以廣大的支助，歐洲的危機纔會成爲一個長期的危機。這號統治階級雖已不爲人民所接受，但他們靠了美國的支助，還能發動一個對革命的反攻，或能阻延安定的建立，一直等到人民，像在納粹德國一般，投向像希特勒般的政權，而希望能從他獲致一個新秩序的基礎。不然的話，歐洲危機將不至拖長，因爲在這裏，恢復秩序所需要的主要元素，差不多已具備。這裏有必需的人力，有大量的技術人才，更有生產資能，祇須配合上必要的安定，足以很快地恢復戰時所受的損失。但是目前所欠缺的正是一個喘息時機，使歐洲能在一個由新興力量爲領導的基礎上重新前進。在世界的現狀下，這個喘息時機的獲致，得從兩種可能：一是美國給予三年或四年的援助，二是自動接受生活程度的減低。這第二個可能，若是沒有美國援助，將先經由艱困的犧牲，作爲社會主義的改革的前奏，然後達到富裕的新水準。但是，若是新興的領導者缺乏勇毅，效能，和理想，也可能使歐洲進入一個新的黑暗時代。

二

美國現在顯然願意予歐洲以援助，但是援助却附有條件。這些條件中的一部份已表明於美國所予英國的借款；大體上說，也是公正地說，這一部份條件是：以前由英國輸出商所獨占的市場，現在須給予美國輸出商以同等機會。另一部份條件已表明於美國所予希臘及土耳其的借款。這二個借款，若是剝除了外交辭令，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於華盛頓所謂「蘇俄擴張主義」危險的一種防禦方法，也可以說是美國的一種恐懼，怕希臘和土耳其人民會步捷克和南斯拉夫的後塵而放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些條件最後復明示於馬歇爾的哈佛演說和此後一連串的官方辭明，包含十二月三日國務院所舉行的記者會議。美國政府準備給予歐洲以大量和較長期的援助，若是歐洲能向美國確實保證：美國援助將不被用像臨時的治傷藥，而將眞實地用於擔保歐洲的永久復興。

若是美國的援助，如馬歇爾氏所描述，眞能依據戰時租借辦法 lend-lease 的原則，——邱吉爾會確當地稱譽它爲歷史上最純潔的一件事，——筆者相信歐洲的復興將絕無問題。這樣一個計劃將保證歐洲政治安定的迅速達到，因爲它將給予該地的新政權以時間和經濟機會，足以用來鞏固他們的權力和馴伏他們所想表現的新社會價值。筆者更相信：此種新政權，尤其在東歐，所從而獲得自身安全的眞實信念，則歐洲民主自由的範圍也會跟着擴大。這計劃更將能

而重新加入歐洲經濟體系。

但是事實上，在馬歇爾心目中，似乎並非以戰時租借辦法為模型。這個事實會預示於美國撤回對匈牙利和捷克的貸款，——這是一個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的，決策，——再預示於美國拒絕英國對於魯爾重工業的國營化計劃。從實際上看來，美國援助似乎將以如下的默示約定為條件：接受援助各國應停止進行其從資本主義社會轉到社會主義的變易。簡言之，美國援助將嚙合到市場經濟中，而後者正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原則。

三

反對者或會指出：具有工黨政府的英國，一部份為社會主義的法國，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占有重要地位的其它各國，都已參加了馬歇爾計劃。筆者認為對此質詢的答復很簡單。沒有了美國援助，英國在此後十二個月內的經濟處境將極端嚴重。工黨政府正尋求保障，以避免像一九三一年一般的新危機。因此，貝文的政策是寧冒歐洲分裂之險，以冀美國援助能使英國獲致全部復興所需的時間。法國政府正恐懼經濟狀況的惡化會使正在戴高樂領導下新組成的反動勢力獲得全部權力。這樣的結局，實際上將是由一個新的維希法國來代替初興的第四共和國，所不同的祇是貝當換了戴高樂。

同樣的結局將形成於意大利：這裏會是一個新的法西斯，而以恢復皇位為先導。筆者認為：在法意兩國，這樣的變化將形成內戰。至於在英國將如何變化，雖較難預測，但至少它將分化該國的勞工運動，使現在全用於增進生產的力量，多消耗於設法抵制在危機中復活的資本主義傳統計謀。若是果然形成現在保守黨所熱烈討論的聯合政府，則將是工黨的滅亡；以工黨政府現所占有的多數地位，想把這樣的計謀施諸該政府，殊非可能。

若是有人提出質問：筆者何以相信美國援助的條件將無法為歐洲新興社會主義領袖們所接受？則筆者的答復將是：據筆者所能見及，這些條件將為歐洲資本主義復活的基礎，而資本主義的復活將是對革命運動的反攻，這種反革命更將形成半個以上歐洲的內戰，而這個內戰很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若是有人指出：美國政府並無如此的希望或意願，則筆者完全同意。筆者所關心的，並非美國政府的意圖，而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若是美國政府已決定——事實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顯已如此決定——維護「美國的生活方式」（這不啻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別號），那麼，美國政府究將如何做法。美國資本主義現所面臨的嚴重問題，祇有一個方法可予以拖延：用外向的橫面擴展，來代替迄今的內向的縱面擴展——後者是殖邊時代所奠定的。這就是說：美國在對於亞洲、歐洲、和中東的關係上，必需是一個投資的和拓殖的國家。這個半意識的必需，足以迫使美國建立種種關係，而這些關係可能和它建立的人的意願無涉。也是這個必需，迫使美國敵視蘇俄，更迫使美國對於德國的重建，堅持以私人企業為基礎。因為這樣一個德國，不僅是為美國投資的廣大市場，並且，當德國已經重建，美國資本家更能控制法國，進而和德國結件以制止蘇俄。

四

歐洲現在正需要一個統一的經濟，像美國在十九世紀中配合其廣闊拓展的大陸經濟一般。有了統一的經濟，歐洲纔具備了經濟復興的一切條件，甚至能引出一個和「文藝復興」相似的偉大文化復興。可是，歐洲的統一，現在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始能完成。資本主義則不能供給該統一所需的任何條件。資本主義不允許大規範的解除軍備。它更不允許充份就業，或是對於原料的有計劃的利用，或是工業和農業間重行裝置的相互配合。資本主義將形成歐洲內部的競爭輸出政策，而不是整個大陸的計劃的輸出政策。最重要是：它將阻礙歐洲工資結構的重行調整，而這個調整正是整個增加輸出問題的最後決定因素。凡是種種目的，祇有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纔能配合得上。但它們卻都同時牽涉到生產關係和財產權法律制度的徹底變易；這變易是使歐洲的小資產文化的歷史，從而結束。無論如何，它們將使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結束。

因此，這種變易正受到迄今為歐洲統治階級者的猛強反對。因為市場經濟一旦被超越，則社會的生產將非為了贏利，而是為了需要，於是價格將不再被決定於市場的自行機構，這個機構正是其它任何組織技術的總樞紐。這些變易將更是特權的被迅速取銷。至少，凡利用愛國情緒做煙幕，驅使彼此本無仇恨的人民從事戰爭，以保護少數人剝削人民的特權，此種特權將迅速地被取銷。進一步說，這些變易將造成遠邁過去任何期代的高度安全，因為，現在所費於國防者，那時將都能用於建設性的生產。但是，歐洲這些統治階級顯然不會輕易退位，除非他們已經清楚地了解：他們已不能倚賴美國援助，來阻當住這個正在增強中的社會主義潮流，來不惜任何衝突而增強他們對人民的傳統桎梏，以維護其特權。

所以，一針見血地說，歐洲的是否還有將來，行將決定於華盛頓，並且將

決定於此後的幾星期內。當然，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歐洲將對美國發生重大的影響，心理的和經濟的影響。在經濟方面，它將迫使美國資本家對歐洲生產品開放其內國廣大市場；還足使美國經濟上已設法延擱了一世代以上的種種問題，遲早就得暴露。它更將大大影響美國的政黨制和其它政治制度。在心理方面，它將迅速地和更生動地使「新政」創建時代所潛而欲發的許多問題重復發生。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將第一次取得美國的信任；也可以說：美國此後所致力的將是「人民的世紀」，而不再是「美國的世紀」；另外一種更妥當的說法是：美國世紀將從而變爲全世界的人民世紀。

正像歷史上任何一個革命前夕，現在是一個幻想毀滅而悲觀的時代。筆者不知道：美國，尤其是少壯的美國，是否具有足够的冒險精神，來採取一個準備自願接受革命的政策。短見地看，這個政策將是對於美國一筆經濟巨款，要求他們勇於自制，正當他們顯然感到雄視世界的時會。但遠見地看，這個政策對於美國普通人民顯然有利。因爲，若是美國政府，用了人民的名義，幫助歐洲資本主義復興，則我們將因而更接近戰爭，排共極，美國既沒有了推銷的市場，最後將不得不在如下兩個可能中選擇：一是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是資本主義和獨裁。當資本主義不復能向橫面擴展時，它會很快地轉過來推翻民主。我們祇須稍究「經濟保皇黨」（economic royalists）對羅斯福總統社會改革所予的反對，就不難了解這個眞理。

五

所以，據筆者的看法，歐洲的將來乃繫於他經濟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獲得，得由於一條艱困的道路，或由於一條文明的道路。前者將是對於美國援助的堅決拒絕，若是援助的附加條件足以阻止歐洲領袖們完成他們所欲達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變易。這更將形成一個世代的苦難，內戰的可能，和由黑暗到光明的緩慢進程。對此種種的畏懼，纔促成了對馬歇爾計劃的熱烈接受。另一條文明的道路則是租借辦法的重現，期間得爲五年，受益國包含東歐及蘇俄。邁此道路，據筆者判斷，「鐵幕」不難戳破，蘇俄潛在的民主力量不難被動員，我們更不難從而解決以解放原子能力爲中心的種種迫切問題。

若是美國政治領袖們對於筆者所稱的文明辦法認爲不能採用，則筆者的私見却希望歐洲的領袖們能採取那個艱苦的辦法。筆者並不認爲這是歐洲的末日，正像羅馬之陷落並非歐洲的末日一樣。它將是長時期的艱困，生活程度的降低，更將是民主與自由的漫長冬季。向領袖們要求如此決策，確是有點駭人聽聞。但是，當文明的辦法已向他們關閉，他們又不願肩負艱苦辦法的犧牲，則他們祇是拖延，而把責任推給後來的人，最後或須在更艱難的環境下來作同樣決策。

筆者尤其認爲英國政府應該做領導者。工黨政府在國會裏旣有廣大的多數，得爲英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基礎，他若是因爲須在暴風雨中完成其職責而遂行退縮，則將是一個懦夫。英國須再度靠其自身的努力而獲救，進而以其榜樣拯救人類的文明，現在正是這樣一個無上時機。祇有不怕暴風雨的人，纔能駕駛他的船，安然返港。

（本刊特約譯者譯）

論保長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三

胡慶鈞

保長，這些活躍於法定行政機構裏面的基層人物，它的出現是依托一套被稱爲「保甲制」的制度，這一種制度又產生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保長的存在究竟是表示中國民主政治的新生？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系統，在地方自治的美名下，用它作爲控制人民的工具？讓我們從現行制度的源流與保長實際的扮演裏，去瞭解它的特性。

苦難的產兒

保長這一個名目本孕育在苦難中國的歷史因緣裏，它的最初出現是見之於衆所習知的宋熙寧間王安石「變法」，安石變法的動機是由於當時國勢的羸弱，強隣壓境，內政不修，他認爲主要是因爲募兵制的窳敗，既不足以禦外侮，又無能保衞閭閻；這樣，安石就適應了當時環境的需要，制定了「保甲新法」。新法的要點一是編人民戶籍，以防容隱奸徒；二是精編義勇民兵，改革原有兵制；保長就是在這種保甲制裏適逢其選的人物。

我們追述保長的這段根源就指明它背負着中國的歷史傳統，現代保甲制的復活，更證明它是一個苦難的產兒。繼續在外患、朝代更迭和軍閥混戰的長期內亂之後，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裂又使得中國重新陷入戰爭的災難裏面。爲了應付當時剿匪區域的實際需要，保甲制便產生在二十一年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的一紙公文裏。這一次的出現顯然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因爲當時的局勢，正有類乎八百多年以前的熙寧時代，保甲制度的功能就可以從保

甲新法裏面得到應有的解釋。

通過剿匪總司令部對各省政府的訓令，在兵荒馬亂之際，保甲制度得到很迅速的推廣，這個由上級政府向下推行的政制，以編戶籍與練民兵為主要工作的基層行政機構，它就把先前呼喊了多年而略具幼苗的地方自治一筆勾消，代替了它的地位。後來，這種主張似乎不足以成為民主國家的政法設備，於是，這個一手由軍事機構呵護的寵兒，又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進入地方自治的範圍之內。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經過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行政院公佈的「改進地方自治原則」，規定了「將保甲容納自治組織之中，鄉鎮內之編制為保甲。」一條根本原則。立法院根據了這個原則也將縣自治法予以修正。經過這次的確定之後，保甲便成了縣地方自治組織的基層單位，代替了舊制的閭鄰。這個原則在二十八年九月公佈的縣各級組織綱要中還沿用着，成功為今天的新縣制。

從二十一年到現在，保甲制從豫鄂皖贛四省開始，逐漸向各省推廣。雖然各省推行保甲制的時期不一，好比雲南直到二十六年才改用保甲的編制。可是現在除了邊疆的盟旗、政教、部落、土司制度之外，保甲制已經風行在內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不用說：這個孩子已經由襁褓孩提而進入少年時代；可是在這前後十五年當中，經歷了剿共，抗戰和正在進行中的內戰三個階段，保長還是一個在苦難中成長的兒子。

沒有民主的傳統

保甲制沒有民主的傳統，保長也不是民主的兒女，我這樣說並不是存心跟保甲制度或者保長開玩笑，我知道保長是當前地方自治行政機構裏面的基層人物。但是我們要瞭解保長的特性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以及當前的尷尬局面，必須瞭解他所依附的制度所具的特質，而這種特質不是從當前保甲制的民主形式所能瞭解的。

要瞭解保甲制的特質還可以從歷史的傳統裏去追尋，可以稱為類似保甲的制度在周朝便已開始，這就是當時的鄉遂制，和稍後管仲的軌伍制，商鞅的什伍制等。自周秦以至現在，這一連串的政治制度一進入了統治者的權力系統裏面，便被作為統治的工具。聞鈞天先生說：

此法制之精旨：在周之政主於教，齊之政主於兵，秦之政主於刑，漢之政主於捕盜、魏晉主於戶籍，隋主於檢查，唐主於組織，宋始正其名，初主以衛，終乃併以雜役，元則主於鄉政，明則主於役民，清則主於制民，且於歷朝所用之術，莫不備使。（見聞著中國保甲制度第二頁）

這一段分析也證明歷朝的類似保甲制，制法者的本意原在把它作為行使政權的一個手段，用以達到管教人民的政治目的。自然，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裏面，特別是達到承平的時代，統治者既不容易也不太需要對農民作如何嚴密的控制；也由於時代的着重點不同，此起彼落，在不同的地區也難普遍設立縣級以下的基層施政機構，地方自治的權力機構就在這種條件下得到伸張。好比清代因襲宋明舊制，在縣級以下原有保正鄉約的設置，可是實際上並沒有普遍認真的推行。有些省份就由氏族組織代行其事。有些省份好比雲南，鄉約變成傳統地方權力結構裏面的人物，由人民自己選舉，政府非但不加以干涉，反而利用這套機構作為推行政令的工具。

民國二十一年公佈的保甲制卻顯然不重視清末以來注重自治的情勢，而在繼承以此為控制人民工具的傳統。由剿匪總司令部為編查保甲戶口條例頒發到各省政府的文告裏面，一再強調保甲制的設立在自衛而不在自治，並且認為全民政治「非目前漠視政治未經訓練之人民所能行使，尤非各匪區蕩析流離之農村民衆所樂與聞。」這種自衛組織應「多由委任，因有命令服從與統馭便利之關係。」

現代的保甲制依照政府的規定，以戶數為單位，在一個地理區域或者社區上加一層法定的規劃，「十戶為甲，十甲為保」是一個共同的原則。戶數和地域兩個因素描寫了保甲組織的性質，保甲組織是在同一地區內有一定戶數的公共團體。

根據二十三年行政院公佈的改進地方自治原則，保甲制雖然進入地方自治的範圍裏面，可是保甲如何組織？組織的動力如何？政府的規定與編制都指明它不是一個人民自動組成的團體。在實際的行政裏，一個保長究竟具備了多少民主的素養？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出身？他做了多少可以符合地方自治的事業？我想在這裏用不着解釋，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為我找到解答。我在這裏只要指出：從抗戰開始一直到今天，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當前的情勢與需要和民國二十一年相較，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客觀的情勢下保甲制決不會中途變質，十五歲的保長是從呱呱墮地時長大的。

平庸的出身

我們從歷史傳統和現實情境裏分析了保長所依附的制度，現在要進而描繪所謂保長的這一流人物，這裏首先要提到保長的出身，看這一個中國政治的基層人物，究竟有多少政治資本？

中國傳統社會裏很早就分化出兩種人，這就是現在所習知的紳士與農民。組成農業社區的份子大多數是在田地裏直接生產的農民，而紳士卻是主要依賴地租為生的少數知識地主或退隱官吏。紳士與農民代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生活程度與知識水準，他們是上與下，富與貧，高貴與卑微的分野，在傳統的社會結構裏，具有聲望的人物不是農民而是少數的紳士。

如果具有聲望的紳士對於保長這份差事還感覺興趣，很自然的上級政府會要把這份頭銜加在他們的身上，可是，在我的記憶所觀察到的事實裏，只知道前幾年為了示範的作用，成都市曾經選舉過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吏擔任過保長外，在遼闊而廣大的農村裏面，擔任保長的並不是屬於紳士這一流人物。

紳士不願意當保長，這份頭銜便推到農民以及紳士和農民之間的人物身上，這些介乎農民和紳士之間的人物：可以是比較清正的小學教師，也可以是專愛打聽是非脫離農作的閒人，也可以是做小本買賣的行腳商人，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不過是「平庸的出身。」

紳士為什麼不願意當保長？我在雲南農村調查時曾經問過許多人，一個普遍的回答是：「這職務與紳士的身份不合！」這句話是對的，可是要瞭解這句話，卻須知道保長的地位與他所擔任的工作。

一個保長擺在政府的行政系統裏面，他是一個最起碼的芝麻小官，從中央而省、縣、鄉、保，一字排下來這麼許多的頂頭上司，「等因奉此」與「仰即知照」，保辦公所變成了「仰止堂」。紳士大體上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他這份錢勢就靠自己傳統社會結構裏面的權力維持，而這種權力在上級政府的統治之下，只希望得到政府官吏的支持卻不願意受政府權力的干涉。這一個芝麻小官的地位，既不能夠裝璜自己，卻徒然把自己推到政府權力的直接壓迫下面，這是紳士所不願的。紳士在這裏表現了他的巧妙才智，把農民一類的人物推了出來，讓他出面，自己在幕後作一個牽線人。握住了行使公務的權力。於是，保長的地位就在這裏面更貶了質，一個保長不是眞正的一保二長，他所做的工作盡是些瑣碎的技術事項。好比徵糧、派款、捉兵拉伕……等等，事情煩瑣得可怕，他沒有權力，除了奉行政府的命令外，還得受紳士之命而工作。

雖然，現在有些地區保長的產生已經具有民主政治的形式，這就是經由保國民大會選舉，可是這種「選舉」的保長也決不會挨到紳士的頭上。據我個人在雲南農村裏的觀察，選舉保長不過是個虛名，在寥寥數人的所謂「保民大會」裏，紳士就可以當場指定誰出來當保長。

平庸出身的保長沒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在縣長甚至鄉長的眼睛裏，保長是一些卑微不足道的人物，以這種「不受尊重」的人來担任推動地方自治的基層行政重任，我怎能不爲中國的民主政治叫屈！

政治地位

不雄厚的政治資本也無法提高保長的政治地位，他得同時侍奉兩個上司：一是上級政府，一是地方紳士。而對着政府權力所代表的統治者的利益，紳士權力是代表地方利益的，兩者常易形成對立的局面，保長就得在這兩種權力的夾縫裏面工作。一個成功的保長是如何在政府權力與紳士權力之間求取平衡，這就是一方面推行政府的功令，一方面顧及地方的利益。可是，保長又如何能夠在兩者之間討好！

我們在前面說過：保長是個苦難的兒子，保甲制成長在干戈紛擾的局面之內。上級政府爲了加強動員和管制一切的人力物力，以達到某種的目的，政府權力就一天一天的往下面伸張，這種伸張的結果使保長慌忙的幾乎盡是上級政府委托的公事。在許多場合下，紳士權力便在一天一天的萎縮。若使政府公事太侵犯紳士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紳士要提出反對，也決不敢公開指摘，只能用拖延的方式或嘀中向政府官吏疏通說情。

不管是「民選」或者經過紳士指定的保長，他都得經過上級政府的委任，進入政府行政機構的系統裏面，在政府權力伸張紳權萎縮的情形下，他盡可以倒在政府的懷抱裏，或者站在行政人員的立場上，來地方辦「公事」。保長可以不顧地方利益，或者藉着奉令徵兵派款的名義，濫收徵糧，以求中飽，現實政治裏正不乏這種的例子。一個想從這裏面獲取利益的人，他就可以活動當保長，活動的方法甚至不惜出錢向官紳賄賂，這樣的保長也就成爲衆人詛咒的對象。

若使保長是一個外鄉人，我想這種狐假虎威營私舞弊的現象也許要變本加厲，可是保甲制却規定保長要由本地人担任。保長既是本鄉人，有着一份鄉梓情誼，同時也得顧及地方團體的社會約束力量，使他們行事都不能不致盡義分，這就加深了保長的矛盾與痛苦。以一個忠實於地方的農民出任保長，他若是對上級政府的公事推行不力，或者無能爲力時，他就得隨時請進縣府的班房，甚至丟掉了自己的性命。一個縣長不敢隨便得罪有力的紳士，他却可以捕殺違命的保長，因徵兵派款不力被押致死或者逼死的保長何止多少，保長眞是一個苦差！

保長所担任的工作和他今日的政治地位，已經是一個正流之士望而却步的陷阱，這就解釋爲什麼人們一提起保長，除了漠不關心之外，往往還夾雜着可恨和可憐。出任保長的人物，不是想從中撈一筆油水的巧謫，就是些目不識丁的忠厚農民，這種局勢如果繼續下去，保長的品質還在一天比一天的低下，他們的出身平庸且更平庸。

保長與鄉約

現實基層行政機構裏的保長有他的特色，這特色我們若是和淸[illegible]制的鄉約加以比較，就更容易使我們瞭解。

我們在前面說過：保正鄉約原是滿淸政府參據宋明舊制，在縣級之下所設置的基層行政人員。可是，在當時農業社會的承平時代，並不需要對農民作如何嚴密的控制，「政簡民輕」的哲學也容許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滿淸政府並沒有嚴格推行他所制定的「保甲法」，當時的編制原是十家爲牌，牌設牌頭；十牌爲甲，甲設甲長；十甲爲保，保設保正。可是這種制度一進入氏族組織嚴密的社會，日久就湮沒不彰。在氏族組織不嚴密的社會，好比雲南東部的農村，這種編制雖然存在，但因滿淸政府的放任政策，編制就逐漸溶入人民自動的組織裏，變成了傳統地方權力結構的骨架，這就是現在的公家與會牌。一個村落是一個公家，按村落的大小，公家編成一甲或數甲，會牌就是甲下的牌，鄉約是在村落的公家機構內執行公事的人物，他的地位出身就等於現制的保長。

承平時代的鄉約所担任的公務並不如今天的龐雜，當時上級政府委托的公務普通只有催租催糧，承辦差傜。在合理的制度下。每個鄉約對於他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應當能夠勝任愉快。可是，皇權統治所培植的官僚作風，規定一個縣官出來也得坐八人大轎，鳴鑼開道。過境的官吏所需要的差傜更多，這些差傜都通過鄉約在各村居民中派給。鄉約的辦事稍有失誤，往往得受縣府差人的逮捕與吊打。另一方面，地方紳士的權力多少還帶着封建的色彩，對於政府規定的錢糧向不繳納，這份錢糧得由鄉約從中貼補。鄉約也得隨時侍奉在管事紳士的左右，紳士進茶館喝茶，或者上館，都常常接受鄉約的招待。因此只要輪着鄉約，便注定是一個貼錢挨打的苦差。雲南呈貢安村觀音寺嘉慶七年的石刻碑記上，有下面的幾句話：

> 古者保長之設，所以衛民而非以病民，後世公務日繁，差傜漸冗，肩厥任者，每有遺大投艱之患：每遇膺任之年，或防患而賄賂求免，或畏難而逃避他鄉。愁苦之狀，莫可勝言！因而互相酌議，約爲善處，本寺中無論士庶，每月公捐錢文，送際二根，將所獲錢銀，制買田畝，收積租息，幫貼保正，以供差傜之需。

鄉約進入了傳統地方權力結構裏面，他的職務是由地方紳士所指派，沒有受到政府的委任。現在的保長可不這樣，他已經進入政府行政機構裏面，是經過政府委任的人物，這就是鄉約和保長顯著不同的一點。因此，一個鄉約的痛苦始終是痛苦，貼錢，挨打，只能自認晦氣，除公家規定的貼補數字外，可不敢隨便開罪紳士，更不敢向人民有所攤派。一個保長的痛苦也許還夾雜着快樂，他可以「公事公辦」，誰不完糧納稅，他可以據實呈報，縣府征收員與槍兵就可進到抗糧人的家裏。政府有什麼需索，他可隨時向人民派款，一個保長每月的辦公費並無具體的規定，也沒有薪餉，可是他不愁自己會要貼錢。一個不能派款，一個隨便派款，這就描寫了權力來源的不同，也描寫了鄉約與保長的不同！

從鄉約到保長，從差傜租糧到苛捐雜稅，徵兵派款，客觀的情勢與保長的工作注定了他不是一件民主的差事。保長如何能民主？保長如何能是民主的兒女？保長的存在如何能象徵中國民主政治的新生？

（編者按：「從社會結構看中國」本來是費孝通先生所寫的一連貫的有系統的文章的一個總名。胡先生這篇文章是費先生寄來的，說可以作爲「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三。「之一」「之二」已刊本刊三卷二期八期。「之四」仍爲費先生所寫，「論師儒」，刊下期。）

請介紹你的朋友
訂閱本刊

觀察通信版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萬鍾民

（觀察北平通信）北方一片烽火。大塊大塊的地方都變成了解放區。政府從面而線而點，現在連幾個重要的據點和幾根相接的斷線都岌岌可危。十一月中榆林危急，運城吃緊；平保段早就不通。石莊雖運去數十億的鈔票，並連日出動各種性能的飛機，仍告不守。並且連保定也發生動搖。華北的局面是已到萬分緊張的階段了！

華北若有問題，則關外將形成孤立；而華中也更要緊迫。因之不待京中的北方大員如鹿鍾麟，張繼等等「力陳河北之重要」，當局早就想對北方作一個好的安排——還在七月裏，就有「華北聯防」之議。但事實上卻一直未曾開展。這次華中六省聯防告成，國防部的華中指揮所成立，蔣主席乃啟節來平。從廿六日到廿九日，一共住了四天。這四天是重要的四天。不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決定了華北的情形要起變化。

主席抵平　將星雲集

蔣主席是廿六日下午五時到北平的。同日下午，張垣綏靖主任傅作義已先來北平。——傅氏在這一年多以來的華北戰場上，早成了一個頭等的角色。榆林一直是他的部隊在堅守，且已幾次打破了共軍的包圍。這次榆林解圍，一方面仍靠他部隊的堅守，而另一方面決定解圍之局的馬鴻逵部隊的來到，又是成於他的邀請。甚至由石莊失守後所造成的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危迫局面，也仍賴他的察綏部隊來支援。——這一支察綏野戰軍，今春曾一度入冀應援，後轉至晉西北。溽暑中又重回平津保三角地帶掃蕩。旋[illegible]蒙邊，至九月中爲應援遼西出關，沿中長路北至昌圖，戰於阜新、彰武一帶。

最近石莊失守，冀局吃緊，再來三角地帶，是爲第三次了。因之名義上華北的統帥雖爲坐鎮北平的行轅主任李宗仁，實際上他手下無兵，而保定綏署主任孫連仲又一事無成；華北軍事早已成了以傅作義及他的部隊爲中心的局面了。蔣主席一到北平，就和李宗仁傅作義長談。第二天（廿七號）上午，又單獨接見傅作義及熱省主席劉多荃。同日，孫連仲也從保定趕到北平。這時在天津及其他各線的將領如馬法五、侯鏡如、上官雲相、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文、九十四軍軍長鄭挺鋒及參謀長等也都紛紛來平。當日晚，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陳繼承等有會談。第三天（廿八日）一個正式的軍事會議就舉行了。

大計決定

這一個軍事會議是上午九時半在北平中南海的居仁堂舉行的。出席的人員有六十餘人，包括所有行轅、綏署的主要官員，各野戰指揮官及平津線上新到察綏部隊師長以上的軍官。計有李宗仁、熊式輝、傅作義、孫連仲、羅澤闓（從南京來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吳奇偉、徐啓明（行轅參謀長）、上官雲相、陳繼承、馬法五、張知行、徐康良（空軍第三路司令）、李文、侯鏡如、鄭挺鋒、安春生（暫編第三軍軍長）、林偉儔、袁樸、軌幼麟、劉廣濟、張伯謹（平副市長、何市長因病缺席）杜建時（津市長）……等。會議一共舉行了六小時，至下午三點多鐘才散。在會上最重大的決定，就是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並宣佈以傅作義當總司令。

北方大計，就在這一天作了重大的決定。

廿九日（這是第四天）早上，蔣主席四度召見傅作義，並接受傅氏所擬方案的報告（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的）當日午後，卽啓程返京。原來隨行的隨員均同回京——只有熊式輝仍留北平。熊是留在北平負責與各方聯絡周旋的，他的任務就是爲傅氏「造橋鋪路」，進行醞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工作。十二月二日，大局已定，就在南京正式發表國府主席的手令：（一）保定、張垣兩綏署卽行撤銷，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二）調孫連仲、傅作義兼北平行轅副主任，并任傅作義爲華北剿匪總司令。（三）晉、冀、察、熱、綏五省軍隊均歸華北總司令部傅總司令節制指揮。

山西問題

五省包括山西。山西有太原的綏靖公署。華北共三個綏署。現在張垣和保定的撤銷了，何以太原的仍舊存在呢？原來太原綏署主任的閻錫山，是傅作義的老上司。在蔣主席滯平磋商期間，傅作義最初本來連組織五省聯防都不敢答應，但結果不做不成。然對統率山西一點，卻一直「謙讓」。最後，乃產生一種權宜辦法：名義上包括山西，但太原綏署依[illegible]存在，并仍由閻錫山指揮，主持晉南軍務。雁北則歸「華北剿匪總司令部」。——雁北原來是楚溪春承閻氏命指揮的，後來楚調到東北，由于鎮河坐鎮。這一次，于鎮河特從大同來，算代表太原綏署接頭，完成了如上的協議。

冀省府總辭

「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傅作義做了總司令，北方局面就大大不同了。

行轅參謀長徐啓明在三號（十二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答覆有關總部的問題時說：「總部一週內可成立，總司令十日左右可以就職。總部地點可能設在長辛店或北平新市區。行轅與總部的關係爲總部負責指揮軍事，行轅負責軍政，對總部也有監督之權。至總部與地方政府之配合，將由總司令視其需要程度擬定方案。關於經濟統一問題，將由各省與行轅商討。」

傅作義不僅是一個「軍人」而已。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的。他的許多原則，并且在蔣主席離平那一天，包括在「收復區施政方針」中以國府命令方式由行轅公佈了。他在總司令職務發表以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那是他回張垣去的前一天，卽四號），也曾發表談話，說軍政配合，必須各有關方面力求聯絡，詳加檢討。而軍事不能單靠打仗獲勝，必須政治和經濟同時想辦法，更爲他歷來所強調：并且是在察綏行之有素的。因之北方政經的若干改變，也將是意料中的事。但這種意料之內有一個意外，卽是五日的冀省委全體向孫連仲請辭！辭職書已見各報。

這個總辭是在當局責難，冀省人士抱怨情形下產生的。孫連仲長河北省政府，又主管保定綏署，年來政治上無建樹，軍事上打不開局面。路透社曾發消息，說這次蔣主席來平又以其「指揮失當」而受申斥，并記大過一次。北

[illegible]消息，第二天又登報聲明「消息之無稽」而表道歉。但無疑他是受盡了刺激的。這次勦匪總司令部成立，他空掛行轅副主任之名，雖仍兼主席，但將受傅氏的若干支配，這當然爲他所不能忍。可是他自己又怎好折台？自己既無法請辭，便只好由他胞澤發難了。

一片慘痛

河北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冀省大部分土地已成解放區，政府區所管有限。而這個區域裏人民的痛苦是與日俱深。（編者按：本刊上期通信「請看今日之河北」一文，已有報導。此處從略）天津大公報以「冀臨參會激昂的質問」爲題，評述：「這充分反映着全體參議員焦急煩燥的心理，同時這也正反映着河北省人民悽惶苦悶憤懣失望的種種情緒」。一再看省府負責人員對於這些質問的答覆，似乎都太嫌空洞，太嫌輕鬆，除訴苦求諒以外，一切無具體計劃，一切無切實辦法。情勢嚴重，問題棘手，而只彈舊調，說空話，轉來轉去依然在一套陳腐的觀念裏兜圈子。：當局這種態度和做法，實在不足應付日趨艱危的新變局」。同時訴述百姓的苦況說：「以現在河北各地的攤派說，確實太繁重也太不合理了。平均每半個月就須出一次攤派：省府原說每田一畝要納三斗糧，現在每畝竟要繳納六斗乃至九斗了。房山良鄉各縣，農民米糧還不曾入囤，攤派就已經逼到頭上來了。鄉間僅僅碗口粗的樹木都被砍光，老百姓一舉抗議，倒要被強派二千民伕示懲。保定修築城防工事，地方派款一次就要五億元，爲掃清視界，人民還須拆房遷基。由遵化平谷一帶逃到唐山難民大軍，至今還無一人得着棉衣。……清宛縣長現所轄不過四十個村莊，而今天正在保定城內大修衙門。這就是太不爲老百姓設想一個例子。」這就是當今河北的苦況——不僅河北，進整個華北都是！在冰天雪地烽火四起的北方，是一片片慘痛景象。

要處理這樣一種地方的政務，事實上也是大不易的。據說熱省主席劉多荃，也表示「倦勤」了。

辦法與環境

傅作義究竟將如何處理華北呢？

傅氏治下的察綏，有着小康的局面。這種局面，是他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結果。據大公報記者戈衍棣報導，他的「政治民主」是徹底實施民衆組訓，提倡廉能政治。在「經濟平等」上的辦法，是發展中層，限制上層，扶植下層。——他最重視經濟，認爲一切都與經濟問題有關。在北平有一次對記者們說：「就是父子之間也存在着經濟關係」。因之他在察綏盡力在經濟上下功夫。他使土地及工廠資金化；規定土地工廠的利潤，使勞工能以分紅一類的辦法獲得工廠的股份，也預備使士兵得到土地股權。現在還在詳密研究平均地權的土地方案，準備下年度開始實施。有涿鹿和張北兩縣，中央已批准了作爲實驗縣的。但他以爲施政應當是全面的，只要適合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是一定擁護的。所以他準備把他的土地方案不經過實驗階段就根據法令開始作全面的實施。這是在綏察。

他被任爲「華北勦匪總司令」以後，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是否準備把察綏的一套辦法用到整個華北來？他答覆是察綏的辦法是應付察綏需要，在華北別的地方當和地方政府方面商定別的辦法。其實他的大原則不會變，並且早在他一被主席內定爲總司令之時，已經主席接納而以法令公布了。這就是十一月廿九日（蔣主席臨走那一天）北平行轅公布的「收復區施政方針」——這是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簽署的「布告」。

這個「施政方針」的布告包括八條。即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收復區地的處理；收復區的佃租；收復區的田賦和稅；救濟貧民；貪污土劣的糾舉與檢舉；人民本身的組織；處置後方共產黨。——這一文件署期是三十六年十一月，但以前並不見在其他地方公布。其中若干條尤爲以前任何法令中所不見。因之顯然是蔣主席來北平後接受傅氏所擬方案以後所產生的東西。像收復區的佃租「處理辦法：「（一）收復區的佃農對地主交納由田租不准超出正產物的三分之一，如果雙方講好要拿錢來納租時，付出的租錢不准超過農產正產品三分之一的價錢。（二）收復以前佃農差欠地主的佃租，不准地主追問佃農交納。」以及「救濟貧民」辦法；「貪污土劣的糾舉與檢舉」辦法：：等都是嶄新的大刀闊斧的手法，也正是他在察綏所用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原則。

但誰來實際執行這些方針，把它徹底做出來呢？這就是一個難題。而今在他尙未上任之時，有發生熱省主席劉多荃倦勤，河北省全體省委請辭等等現象，已表示前途之難於樂觀！

華北現在有了傅作義這樣的「勦匪總司令」，也想出了好些傅作義在察綏那種好辦法。但華北再沒有像傅作義那樣能行的人，也沒有再如他察綏那樣的好環境。冰天雪地的華北，四處的烽火恐怕還不能很快息滅！

共軍入川之勢

鄧威

（觀察西安通信）

在全國軍民視綫集中大別山會戰的今天，陝西的戰局却在醞釀着新的變化。由於消息封鎖得很澈底，陝境戰局很難窺其全貌；雖在指揮部所在地的西安，也無法窺其底蘊。可是從陝北，陝南等地來西安的各色人物口中，可以知道不少的消息。

就以榆林之戰來說，就攻堅言，彭德懷是失敗了。可是就他吸引國軍實力來看，他得到了某種限度的成功。這次國軍投擲在榆林戰鬥的人數，前後有守城的第二十二軍，鄧寶珊所率南下應援的第十七師，和由西路東進的寧夏兵團計一個師及一獨立旅，可以說使用了能和兵力。共方所發動的榆林攻城戰，最大目的還是想吸引各路的援軍到榆林外圍，而他們想伺機迂迴到後面去找便宜。所以當馬敦靜部輕騎銳進時，彭部的兩個旅避開了馬部的鋒芒，繞到他的後方三邊一帶去。現在安邊雖然收復了，可是這兩個旅並未擊潰或驅退。另外約有四個旅左右遠據榆林東北二面。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發出呼籲說：「近日所獲匪情，共匪確有三次再犯榆林企圖」。現在很明顯的，彭德懷吸引了三師左右的國軍（尤其是將寧夏隊伍引出來了）在榆林附近，而他的那五六個旅却採取了機動態勢，膠住了國軍近三個師；易言之，在行動上減少了他三個師的對抗力量。今日陝北的整個情形，在官方是不宣佈的。可是在零星片斷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些。譬如祝紹周在本屆陝省參會作施政報告時，就說本年秋因共方在晉南、豫西、陝北同時發動竄擾，陝北國軍不敷分配，所以放棄了若干不必要地點。這些放棄地點的難民隨國軍轉進，多集中在延安，甘泉等地。這裏揭露了一個存在已三個月之事實，即國軍在陝北所能確保者爲延安、甘泉等三數縣，其餘如延長、清澗、延川、綏德、米脂等地，僅僅是地方團隊在撐持。國軍劉戡，董釗這兩個整編軍主力部集中在保衛延安了。而現在董釗兵團又另有任務。

武漢大學自治會普選記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武昌通信）選風吹遍了珞珈山。十二月五日，武大完成了它第一次的自治會普選。這是「六一」的寃血所凝鍊而成的里程碑，刻劃着民主的前進方向。

武大在樂山時，校舍東零西散，距離有途五六里路者，同學間極難連繫。遇有重要事件發生，向由各宿舍推舉代表，集合商議，推個臨時主席，事情完畢，主席的身份亦隨之結束，從來沒有組成一個正式健全與整體性的自治會。復員以後，雖然開始有了自治會的組織，但是因習慣傾，最初選是以齋舍爲組織單位，產生代表的。過去自治會的選舉並不公開競選，只在暗中活動，並且多少受着地域觀念的支配，甲省人選甲省人，乙省人選乙省人，政治色彩極其淡薄。年來種種創痛，使同學們深感原來的組織章則和選舉方式，應加修正。經過六百多位同學的簽名要求改組（達到法定人數），並提出了一個方案，公佈五天（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無人反對，遂成定案：立法機關由系級產生代表組成，執行機關由同學提名競選。普選在武大是創舉，尤其在這整個國度裏正在受着選災底煞煎的時候，同學們都以激動而嚴謹的心情，來開讀這民主的第一課。

組閣與競選

什麼人「組閣」是同學們最關切的問題。最先傳出的是××軍集團組閣的消息。由於年來各種事實的慘痛教訓，同學們對此實有不寒而慄之感。接着傳出來的是崔明三組閣（即這次當選的福利競選團）的消息，但流言立卽散播，帽子也平價拋出，說崔閣左傾，受人指使。接着又有唐汝厚組閣（卽這次敗選的競選團）的消息，他們以「自由份子」爲號召。崔唐二閣的發展，遂成爲同學注意集中的焦點。提名後，××軍集團組閣之說，終于流產，所以實際參加競選的祇剩了崔團與唐團。武大同學很嚮往于英國的政治制度，祇有崔團與唐團，却也近似英國的兩黨制度。

系級代表會曾規定競選不得攻擊私人，競選演說只能限于政綱政策的範圍。這是一個良好的風氣，這次武大普選，大體上也確能做到了這點。崔團領前發動競選活動，他們擁有女高音，運動健將，事務專家，伙食能手，包括了文法理工四院，一二三四各級，眞可謂人才濟濟，聲勢煊赫。一頓午餐時間，各式各樣的標語貼滿了整個校舍。他們的「政綱」是注重同學福利，他們宣稱他們的態度是坦白公開，不推，不拖，不拉；發揚武大民主，自由，進步的傳統精神，他們並出「閣員」介紹專刊，展開競選募捐。接着而來的是唐團的活動。唐團和一反崔團的作風。崔團是鋪張，唐團是樸實，唐團的活動，祇稱爲「筆記簿式」的活動，因爲唐團宣稱：他們是些自由份子，他們不募捐，所以祇用空白的筆記簿，由借着學校的油印機，印點政綱和閣員的名單，分發給同學。他們標出：「作事認眞，態度中正，不偏不倚，都是自由份子」。雙方的外圍團體，都出競選專刊 強調競選的態度，締造正常的風氣。在四日晚上，唐團選主辦了一個冬季晚會，有歌詠，獨唱，閣員大會唱，邊疆舞，踢踏舞，話劇等等。節目精采會場空氣活潑。晚會開始時，他們爲唐團三呼——Three Cheers for 唐汝厚競選團，他們在在學習着政治家應有的風度。

競選演說

在投票的前一天（四日）的下午，系級代表大會常委會召開「競選演說會」，唐汝厚的演辭是：

「我叫唐汝厚，政治系四年級，今年三十二歲。首先，我要闢謠：第一，有人說唐汝厚競選團缺乏人材，毫無工作表現。其實並不是我們沒有人材；而是我們不願意作過於鋪張的宣傳。第二，漢口某報說我們到處拉票，份子複雜，這與事實不符。第三，有人說我們有什麼背景，其實，我們都是自由份子，並無任何背景：……『福利』原是

陝南的局勢，更潛伏着極大危機，因爲共方陝豫的交通綫，國軍始終未能截斷或控制。已經深入到鎭平，內鄉一帶的陳賡部，始終還留下了一股兵力在洛寧，盧氏地區，一方面牽制國軍以減少對陝南孔從周之三十八軍及李先念之獨立縱隊的壓力，一方面等於給孔李等安置下一個預備隊。趙壽山股早已進入湖北境，鄖西，白河都有他們的人。陝南重鎭——鎭安，在廿日上午爲國軍克復，可是在距大巴山五十公里的安康附近又發生了新的情況。這一新形勢的出現，意味着事態相當麻煩。國軍是最不願任何一股的共軍竄入四川的。在大巴山南麓地區原來有些「土八路」，（一說是李先念的殘部），巫溪一帶的治安情形就不太好。假如孔從周竄入了川境，那將使國軍從事另一新形式的迷藏戰了。據白崇禧部長表示，劉伯承一股也有西竄入川的企圖。這種見解相當正確，因爲他不能長期過着流竄生活，必須找一個立足點。以現在局勢來看，逗留在豫南的陳賡部似在等待劉伯承的大別山突圍，然後合股集中主力向川陝邊境竄犯，劉，陳，孔，李四股合流。民國十五年，劉伯承曾來投共時，在四川順慶與四川部隊田頌堯等激戰突圍，經川陝邊而達武漢，就任第十五軍軍長。那時他走的那一條路，今日他未嘗不想再由此逃回去。可是就雙方戰略地位及軍力對比上而言，應該是不可能成功的。白部長曾稱要在本年底解決劉伯承。現在劉也面臨背城借一的形勢。孔從周股竄向大巴山的企圖，若將劉，陳，孔三股連接起來看，孔從周算是一根觸鬚，這根觸鬚已向四川試探了。國軍當然知道這種形勢的緊張，所以川陝聯防早已開始準備。抗戰期中駐防陝西的川軍，担負了保衞家鄉的重任，傳說胡宗南將軍又將負責川陝聯防的指揮。川籍師長潘華國（潘文華之侄）於本月初曾來西安，晉謁此間軍事負責當局，現已赴寶雞轉廣元。

現階段的戰局，如從純軍事觀點觀察，黃河以南的共軍面臨生死的鬥爭，這一地區的國軍也面臨極重大的關頭。因爲到目前爲止，共軍還未能在任何地點立下腳，是一個很好的殲滅機會。同時共軍也是形成一拚死活的態勢，這將以劉，陳，孔等能否合流竄入川北山區爲一評斷標準。很顯然，大別山區不可能長留，伏牛山區太貧瘠，無法支持龐大部隊的給養，桐柏山區也與大別山區同爲國軍之心臟地帶，欲留而不可得。所以白部長說他們欲竄川，是有戰略眼光的判斷。

大別山麓戰鼓正緊，大巴山區警號甫鳴，這一個冬天，是黃河以南地區雙方戰鬥的決定期。寫至此，獲悉劉伯承突圍已部份成功，陳賡在宛西接應劉伯承的趨勢很明顯，局勢如此嚴重，難怪國軍忙於由陝南調大軍往川北去塡補那一片眞空地帶了！

秀才遇見兵

石熙文

（觀察北平通信）十二月二日北平經世日報的要聞版第二條新聞登載一段倫敦廣播：「路透社上海一日專電：蔣主席因華北局勢嚴重，上月杪曾飛往華北召開軍事會議，改組剿匪機構。聞南京前，令河北軍事當局死守保定，指揮失當之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孫連仲，指揮失當，記大過一次。」

這當然對孫連仲主任有失尊嚴，於是在當日的上午十時，他的參謀長×××傾自豐台（保定綏署所在地）打來電話。可巧接電話是一位新到任的庶務股辦事員尚潔，這位參謀長便大發雷霆的責問他一大片：「誰是負責人？你們的社長姓什麼？為什麼登載新聞不負責任？」弄得這位辦事員驚惶失措，莫明其妙，祇是說：「現在這裏沒有負責人，我是報社裏最小的職員，我們的社長是蕭一山，請你直接打電話給他好了。」正在吵鬧不開交的時候，該報經理趙瑞琦，走進辦公室，趙辦事員便將耳機交給趙經理。趙經理便向對方詢問。這位氣焰萬丈的參謀長，好像把電流都集中在這條綫上厲聲說：「我是保定綏署的參謀長。」然後他又反問趙君，經理答稱姓趙。這位參謀長聽到口音和剛才接電話的趙辦事員一樣，而且姓趙，以為仍是原來接電話的趙辦事員。便斥責說：「還是您，不給你說話，找你們的負責人來答話」。趙瑞琦便說：「我是經理呀！」對方於是才緩和追問：「你們報上登載孫主任的消息，從何來源？為什麼不負責任？何人是編輯？你們完全是造謠，是否有共黨潛入報社？」趙瑞琦回答說：「現在編輯先生都睡覺了，我祇負經理部份的責任，有何見敎，請向社長交涉罷？他在行轅的電話號，是三局五七一〇」這位參謀長空嚷了半天，聽來更不得要領，便大失所望自動將所電話耳機放下了。

當日下午便有三位處長親來報社問罪。經理謙和的接見，機警的間答，心平氣和的解釋並且，錄音員就是中央政校畢業的學生，毫無蓄意攻訐誹謗的動機。但是其中一位——保定綏署民事處紀處長，一定要見社長。趙經理說：我們的社長，就是北平行轅祕書長蕭一山，他正在行轅辦公很忙，不能來此，請諸君可到行轅去見」。還句話，竟把他們惹起火來，他們立刻責難說：「我們是來找經世日報社長的，為什麼要去行轅？不要拿大帽子壓我們」。趙經理說：「孫主任也是本報股東之一，我們決無故意侮蔑之意，僅是收「倫敦廣播消息」。但來者認為該報一定有共黨份子故意造謠，並且警告說小心手溜彈呀？趙經理笑謂：「我們很歡迎手溜彈，快結束這個窮報館，免得我們活受罪。」

雙方糾纏達三小時，他們看蕭社長不來，難以下台，便提出來的美敦書三條；（一）經世日報須在十二月三日要聞版內（即刊載該條消息原地位）更正該項錯誤：（二）以報社負責人名義向孫主任道歉；（三）懲處編輯部負責人及其聯帶負責任者，須以事實及書面答覆。

在這「戲劇」的年頭，雖然發行人是北平行轅的祕書長，到底是秀才遇見兵，報社祇有一一照辦。其實強迫更正，如泥人洗澡，愈洗愈髒。自從保定綏署間諜案被破獲後，跟着石家莊失守，當時，人的心理，已是不甚安定，而接連河北省臨時參議會的議員們又像排砲似的公開指責，現在一個民營報紙竟也同他過不去，難怪他要觸動肝火。同時看到該社長蕭一山致孫主任的道歉函，也便知道「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地位了：

「仿魯主任晉兄勛鑒：本日本報所載倫敦廣播消息一則，涉及鈞座，深覺不安，除飭主管人員就原地位登報更正外，並將負責編輯予以懲處。本日紀子培、劉莊如、黃啓和三處長來社，所提各節，均一一照辦。弟深信本社同仁，對吾兄事業勛名，素極敬佩。一時疏於編檢，事出無心，尚希海涵，萬勿介意。」

空頭支票，不兌現的名詞：「朱訓導長曾說過，我們學校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自由份子，我是其中之一，那麼，自由份子當然應當投我的票！」

當崔明三同學走上講台時，會場的氣氛驟然緊張了起來，許多人心目中，認為他或許會對唐汝厚有所反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隻字不提及，他說：「我不會談話，而且也從來沒有在這麼大的會場中說過話，有不周全的地方、希望同學們指正」。首先他強調武大必須自由、民主、進步、然後它才能成為眞正研究學術的學府。其後他再三申敍他們決定尊重同學的意見，接受同學的批評，對於有關同學福利的事，只要能力所及的，決對盡力去作。不推、不拖、不拉。最後他說：「我們的態度是誠懇、坦白、公開！願所有的同學能和我們齊力合作，把武大建樹成為最完整，最理想的讀書環境，使武大的學術地位提高，穩固，使武大眞正成為華中的文化中心！同學們，讓我們攜起手來」！

會後，同學們都在評論着雙方的演講。綜合各方的意見，認為唐汝厚同學的口才流利，姿態英俊，是一個能幹的青年。崔明三同學雖然不會說話，但他誠懇的態度，寬宏的度量，魯國男兒的樸實氣質，尤其令人欽佩，使人感到和藹可親。

投票

投票從五日上午十時開始。正如訓導長的話：「六小時功課的代價，換來民主，該是大的收穫」。投票所設在大禮堂。門前兩副彩色的大畫：「崔明三將帶來福利；唐汝厚是自由份子」。同學們密層層地擠在取票的地方，換到輪次，掏出學生證和私章，默默地接過選票，鄭重地寫上自己所要選舉的人的名字，投入了票箱。他們的心情是興奮的，然而他們的態度是嚴肅的：他們整個的身子都在顫抖，然而他們却驕傲于他們之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

從上午十時起到下午五時止，投票的人數達一千四百九十四票，估選民百分之八十左右。

光榮屬于民主

下午七點鐘的時候，大禮堂擠滿了同學，等候開票。崔明三唐汝厚兩同學並坐在一起，彼此談笑自若，極其親睦。開票前，先由訓導長致詞，指出此次選舉的三大優點：一、投票人數踴躍；二、選舉事務辦理認眞；三、各競選團能守道德；又指出三個缺點：一、記名投票；二、不應停課投票；三、各競選團工作大綱多是「請求學校⋯⋯」而少自發的事項。接着督網約教授提出三點希望；一、希望勝利的競選團能遵守諾言；二、希望失敗的競選團不要洩氣；三、希望將來中國的事情也能用投票的方式解決。掌聲震撼着整個的會場。

開票了，大家都寂靜肅穆，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中接受將要來臨的結果。一票票的唱，一票票的記。忽然開票人高聲說：「這一票是唐汝厚投崔明三的。剛才有一票是崔明三投唐汝厚。他們互投一票」。於是全場立刻掀起巨雷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開票結果，崔明三得了八百五十九票，唐汝厚得了六百二十五票。在不斷的掌聲和歡呼中，崔明三和唐汝厚被擁上了台子，唐汝厚他趨前和崔明三親切地握手，當衆交給崔明三一封慶賀的信，承認自已的失敗，並表示以後竭誠擁護。第二天崔明三也回了一封信，願共為武大的安定進步而努力。武大這第一次的競選終于在圓滿愉快的空氣中告成，正如朱訓導長所說：「這不僅是崔明三的勝利，而且是武大民主的光榮」！

編者按：這次武大選舉，我們共收到奧秀、晉風、何高、小林、呆子五位同學的通信。每封通信都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但我們讀後，對于這次武大同學在競選中所表示的風度，印象至深，極願為之表揚，所以我們不惜在百忙中，抽出一個下午，就五位同學的通信，續要重寫如右。我們希望還五位同學能夠原諒我們沒有能夠單獨採用你們之中的任何一篇。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余才友

簡歷：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生於江蘇寶山羅店鎮。民十一（一九二二）卒業清華學校。民十二（一九二四）卒業美國達茂大學，文學士。民十四（一九二五）美國優生學館研究員。民十五（一九二六）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碩士（動物學）。民十五——二十五（一九二六——三四）上海，教讀，撰寫刊物（新月，中國評論週報，優生月刊，華年）。民二十五——至今，清華大學教授。

在一間整潔的書房裏，隔着一張寬大的寫字台，我訪問了當代的人文思想者潘光旦先生。

是一個晴和的天氣。美如仙境的新林園景把書房裏陪襯得異樣平和，異樣雅緻。寫字台上的陳設考研而富於風趣。點綴在那蒼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寶的兩旁，那黝紫色的，給影刻得像棵小樹樣的台燈，那淡藍色的小石獅子，那乳白色的小鳥蛋兒……都可以間接地說明它們底主人有獨立特行的個性。

「你找找，那裏面有我過去寫的一篇文章，人文思想的骨幹。」因爲潘先生知道我底來意，所以指着窗台上的那幾本人文月刊的合訂本說。

一會兒，我找到那篇文章了。那是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十五日發表的。潘先生本來在寫信，於是仍舊繼續他那尙未完成的工作。跟着，在他慈祥的笑容裏浮現了一層靜穆的莊嚴。使來訪的客人覺得他是和藹可親的長者。同時，也是藹然可敬的大師。

潘先生底人文思想分做四方面。一方面是對人以外的各種本體。一方面是對同時存在的別人。一方面是對自己。一方面是對以往與未來的人與物。後面三點我已經有了粗淺的認識。所謂對同時存在的別人，可以分做兩點。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點是人的類別和流品。人與人間的關係包括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等等。而人的類別和流品就是性別，血緣，形態，操行和智慧。合起來，成爲儒家所稱的人倫。前面一點是動的人倫之用。後面一點是靜的人倫之體。而所謂對自己，就是要對自己底感情有節制，有分寸。發情止禮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方面的理論根據。而所謂對已往和未來的人，就是要使人承認「來蹤」，要響「去路」。承認「來蹤」就包括「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一類的意思。要響「去路」就包括「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類的意思。這三方面，我因爲聽過潘先生底社會思想史，所以還記得相當淸楚。

但對第一方面，潘先生雖然在社會思想史的班上講得異常詳盡，不過我現在的印象好像有點兒模糊了。所以我輕輕地把那本寸半厚的人文月刊的合訂本打開了。我想摘要地把「人文思想的骨幹」讀一遍。

「第一方面當然是最基本的。所謂各種本體，可以包含許多東西。最粗大的是西洋的神道與物道，或中國三才中的天地兩才。但是許多人道範圍以內的事物，大之如文化的全部，小之如一派信仰，一種制度，一個階級，也往往會畸形發展到一個尾大不掉的程度，使人不但不能駕馭，反而被駕馭……

「人開闢了各式各樣的物質環境，他自己應該是一個主體，物的環境是一個客體。但結果往往會喧賓奪主，甚而至於反客爲主。人也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意識環境，如宗教，道德觀念，社會理想之類，他自己應該是一個主體，而意識環境是一個客體。他自己的福利是一個常，意識環境的形式與組織是一個變。應執變以就常，不應反常以就變，但結果也往往弄得常變倒置，主客易位……」

讀到這兒，我倒想起一個問題來了。這問題是當我讀完奧格本（Ogburn）底「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之後就老在想着的。奧格本把文化分做兩種。一種是物質條件。一種是適應物質條件的方法。當物質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那種適應性的方法也要跟着發生變化。但因爲物質條件的變化可以纍積而且十分迅速。所以適應性的方法的變化往往遲落在背後，形成一種 Cultural lag 的現象。這奧格本說就是社會的失調。而因之，許許多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就都從這兒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和馬克思底理論在本質上沒有甚麼分別。馬克思說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在先，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在後。前者發生變化，後者也要跟着發生變化。最初配合着某種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是社會演化的推進力，到現在反而成了一種障礙。所以必然要引起革命，使社會結構被揚棄，被調整。

但是，問題跟着來了。那就是，所謂物質條件的變化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所謂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變化又是怎麼樣發生的呢？這問題一直留在我底心裏沒有得到合理的解答

好了，當我讀完了潘先生底這一節文章，這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了。功能派說人是本體，文化是手段，和人文思想大致相同。從這裏，可以知道奧格本和馬克思有同樣的錯誤。就是他們把文化看成了那麼一個可以離開人而存在，而發展，而演化的東西。所謂文化，無非是人在控制外在環境所想出來的辦法。那麼，所謂社會失調，是不是因爲人所想的辦法不周密，不合理呢？要是人所想的辦法周密了，合理了，那也就沒有甚麼社會失調的現象了。

這時候，潘先生寫好信了。我於是把人文月刊擱在一邊，開始問着：「潘先生覺得功能派的文化論怎樣？」

潘先生說：「人文思想和功能派的看法相同。不過功能派着重在文化的解釋。直接談到人的地方比較少。

當然，人文思想是大部份建築在生物學基礎上的哲學觀，從人出發，又歸宿到人，着重點在人。而功能派的看法與方法可以說是從社會心理學出發，着重點在文化。兩者是有些分別的。

潘先生接着說：「任何東西不宜太多，No-thing too much，希臘人底看法是對的。涂爾姆(Durkheim)一派的社會思想，專門注意集體意識和社會事實。所以有些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因爲他們忽略了人對社會的影響。」

「任何東西不宜太多，這原則和儒家底中庸之道有甚麼分別？」

「人文思想是包括着中庸之道的，並且是以中庸之道做核心的。人介乎天地之間，執中有權。所謂天，自然之天而外，其餘是人想像與創制出來的。比如宗教，西洋人把它當作目的，但中國人把它當作手段。而所謂地，自然之地而外，其餘也是人創制出來的。所以中國人不重視神，也不重視物。這就是中庸之道的一個適用，和希臘人底看法沒有甚麼分別。」

對了，在社會思想史的班上，潘先生曾經說過，任何抽象的東西都可以謂之天。任何具體的東西都可以謂之地。天地二元，但一元於人。文爲天，質爲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末爲天，本爲地，末本兼賅。博爲天，約爲地，博約具備。西洋的唯心論也就等於天，唯物論也就等於地，但中國人認爲兩者應該兼容並包，不應該分甚麼高下。不過，問題又跟着來了。這一來，人是不是可以目空一

切，是不是可以唯我獨尊呢？

「潘先生，人是不是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呢？」

「當然不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獨尊。人文思想不過要我們防人以外的的本體，或儼然有本體資格的事物出來喧賓奪主，以至於操縱我們底生活。換句話說，人和它們的關係，都得有一個分寸。孔子對於天道，鬼神，始終保持一個存疑的態度，不否認，也不肯定。在董仲舒的眼光裏，通天地人三才的纔配叫做儒。總之，我們對人接物的態度要居敬，要自謙，要虛己。」

「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和人文思想有沒有分別？」

「在人文思想的四方面，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始終沒有超越出第一方面的範圍。那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人，在人文思想裏並不是最高的典型人物。」

「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重心是甚麼？」

「全部中國的文化史始終是一部重人道的文化史。各派思想中，比較最有線索，最有影響的始終是儒系。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不同。希伯來文化是重神的。希臘文化是比較重人的。中古時代和希伯來相像。文藝復興時代想恢復希臘時代的精神，但沒有成功。到近代，西洋文化又是重物的。結果，人可以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反而不通人事。最近，我曾經寫過一篇人文學科東山再起的文章，就是對這種違人的趨勢的一個反響。」

「關於倫的涵義，在靜的一方面似乎很少聽到。」

「是的。中西的思想，在先秦與希臘以後，講到倫，完全偏重在動的方面。最近生物學發達了，於是靜的人倫才受到一般優生學者和教育家的注意。但在日常生活裏還是沒有多大勢力。在中國，以前是動靜兩方面並舉的。但現在，一些研究倫理學和人生哲學的人大多注重動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這倫的體，倫的基礎。」

「所謂人的類別流品和人與人的關係究竟有甚麼聯繫？」

「先要明白了人的類別和流品，才可以談人與人的關係。動的人倫是建築在靜的基礎之上的。靜的人倫重在理智的辨別，是在自然變異的基礎上而用價值的觀念來評量的。而動的人倫重在感情的運用。但是，在感情的運用上，中國人並不一視同仁。一視同仁傾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沒有分別。」

「基督教的禁慾主義在人文思想裏有甚麼地位？」

「對自己感情的控制，人文思想者主張節制，有分寸，而不主張禁慾。實際說來，禁慾強人所難，是不可能的。文藝復興以後的自然放縱主義可以說是對禁慾的一個反動。比如美國禁酒，可以說是強人所難。在開禁之後，美國人底放縱可以說是對禁酒的一個反動。但中國人懂得節制，所以不飲過量，不及亂」。

在社會思想史班上，潘先生曾經說過，衡量一個社會，可以有幾種尺度。一種是社會的穩定或者社會的秩序。一種是社會的進步。一種是民族或者種族的綿延。這裏面，社會的穩定或者社會的秩序靠個人的通性。社會的進步靠個人的個性。民族或者種族的綿延靠男女之別。對於這』可以和人文思想的後三方面的範圍相配合。所謂個人的通性，要在人倫的原則下才可以得到調協。而個性，要在節制的範圍裏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發展。所以我問着：「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思想對社會的貢獻是甚麼？」

「民族種族的綿延當然靠男女之別，而愼終追遠與無後爲大的思想對民族種族的綿延可以說是一種助力。到現在，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除開中國人，差不多都已經滅種了。這不能說不是這種思想的貢獻。」

「那麼，在西洋文化裏沒有這種思想嗎？」

「這在西洋文化裏是不發達的。一直到最近，一部分的民族思想和淑種的優生學才比較地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 × × ×

「潘先生底家庭背境——」

「從洪楊之亂以後，我家一連四代沒有過一間房子，一塊田地。我祖父和我父親都是坐冷板凳的。到父親手裏，坐冷板凳算是坐出頭了。父親中過舉點過翰林。不過他不喜歡作官，專門從事教育事業，在江蘇寶山縣原籍辦過許多學校。前清末年，當過資政院議員。民國初年，參加過當初的國務院，不久就在北平去世了。」

「潘先生進清華唸書是在民國幾年？」

「民國二年。那時候我才十五歲。進清華也是我父親底意思。在清華，連病一起，我一共就了九年。我底腿是跳高跌壞的。因爲不小心，結核菌進去使發炎了的骨節潰爛起來，我沒有辦法只好在民國五年把它鋸掉了。」

「潘先生到美國去是在民國幾年？」

「民國十一年。我那時候因爲對優生學有興趣，所以到美國之後，決定學動物學。」

「潘先生從美國回來之後就進清華教書了嗎？」

「沒有，我從民國十五年回國後，還在上海一共就八年。那幾年裏，我除了在上海幾個大學裏教書之外，還担任過青年會的工作，編過英文中國評論周報，華年，優生等雜誌。時事新報的學燈，我也編過幾年。到民國二十五年，我就被約回到清華來了。」

「潘先生有些甚麼愛好？」

「除了收藏書籍，我就只愛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會約我到各地去講演的。在雲南我每一次暑假總要到外面去跑跑。」

「潘先生底個性恐怕對黨派生活不大適合罷？」

「是的，我對於形式上的種種約束，是不習慣的。」

（上接二十頁）

乙：正是差不多，因爲這實在是講不完的題目。我說過限於時間，所以只能勉強再補充一點。下面說到文學傳統，只有向過去看的詩人才對傳統敬禮。但同時一個詩人會向未來看，他的思想情愫比他的時代更進步，一般人缺乏他的先知遠見，一定看不懂他，說他晦澀。要看懂他，也許得再隔一百年兩百年，等到他所早先看到想到的，別人才慢慢開始看到想到。這樣的詩人，身前不但不受注意，甚至被人誤會攻擊，但身後往往聲名一天高似一天，近代英國詩人 Blake 便是個好例子。

甲：照你說來，好像凡是晦澀的詩都有爲它辯護的餘地。

乙：不盡然。詩人必須忠實於自己，他心裏有值得說的話，所寫的正是他心裏所要說的。假如一個人本沒有東西可說，或是沒有值得說的東西可說，却偏要說幾句，還要假裝似乎值得說的，於是故意彫辭琢句，玄之又玄，不但別人看不懂，他自己也未必懂，這也是晦澀之一，可是起因是以艱深文其淺陋，大可不必爲之辯護。

封底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
本刊每期實銷二萬五千份

全面：五百萬元
半面：二百八十萬元
1/4面：一百五十萬元

談詩歌的晦澀

戴鎦齡

甲：大致地說，我很喜歡詩，讀詩比讀小說戲劇更感到興趣。但有時我灰心極了，一首詩讀來讀去讀不懂；不明白詩人既要寫詩，爲什麼寫得那麼深奧，敎人看不下去，曾經有一兩次我決定以後不讀詩了，但我知道我還是很喜歡詩。你看我是多麼充滿矛盾的一個人！

乙：你的讀詩經驗多數人都有過，我卽是其中一個。你不能因噎廢食，讀不懂就以後不讀，我勸你還是繼續讀下去。有些批評家，例如 Herbert Read 等人，以爲越是好詩越難懂。如果遇到不懂的就不讀、這能算得喜歡詩麼？也許有很多好詩，你根本失去欣賞的機會，豈不可惜！

甲：那麼，看不懂有什麼辦法？

乙：哪有一看就懂的詩？我不是說越是好詩越是難懂麼？語文的程度，修養的高低，閱歷的多少，都能影響你的懂，這些上面值得下點工夫。

甲：假使語文、修養、閱歷等都已經不壞，是否每首詩都能看懂？

乙：不一定都馬上能看懂，但看不懂的或許可以慢慢看懂幾分。能懂全部，就算你的運氣了。

甲：可見「懂」這一回事眞不容易。記得有些詩人十個讀者就有九個覺得不大好懂，注釋家費盡畢生的力量去考證講解，所給予後人只是滿紙空言。卽是一個顯豁的詩人，偶而也會來一兩首晦澀的詩，敎人莫名其妙。你說奇怪不奇怪？

乙：毫不奇怪。主要因爲一個詩人對於事事物物有他的看法想法。

甲：我承認詩人有他的看法想法，而且比通常人看得更眞，想得更深。但這和他的詩的晦澀有什麼關係？

乙：我先問你：他既有他的看法想法，可見他跳出通常人的限度看法想法，那麼通常人的陳腐語言能否表達他所看到想到的呢？

甲：我想不能。

乙：問題的癥結就在此。詩人對於事事物物既有獨到的看法想法，當他表達他的看法想法時，一用陳腐語言，所要表達的就變了質，打了折扣。爲要忠實於自已的思想感情，不折不扣把它表達出，他不得不慘淡經營，幾經推敲，鎔鑄一種新鮮的語言，這種工夫本身便是創造，幾乎是極其困難的創造。但凡是大詩人，必定能創造自己的語言，由於他的語言的特殊，他就成爲不好懂了。

甲：你提出語言創造問題，甚是有理。韓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他指的散文，詩自然更是如此。不過很多詩，文字相當簡單，並不特殊，本來大家懂的，但一經詩人使用，便顯得奥妙，又祇好說近於晦澀。詩人似乎驕傲約約其辭，敎讀者捉摸不定

乙：原來詩人有個習氣，不愛明說，愛暗說，不愛直說，愛繞彎抹角打譬喻說，儘管用字淺，却有深遠的寄托，所謂言近旨遠。

甲：古人解詩「比興」的說法，就指這麼？

乙：正是。你舉出詩經比興的說法，甚妙。卽是後來楚辭裏的美人香草，你以爲眞指美人香草麼？屈原不那麼呆板，他不過借題發揮，別有所指。很少的詩人不用明喻暗喻的，這是不愛直說的明證。西洋有些千言萬言長詩，只是一個 Fable，一個 Allegory，走到極端，有時流於所謂 Metaphysical Conceits，或是近代的象徵派作風。這些詩假如照字面去解釋，難免以文害辭，以辭害意。

甲：原來文字上寫一件東西，意義上指另一件，我以往太拘泥於文字的本義了，難怪晦澀不通。

乙：但一經道破，雖不能全通，晦澀的程度總該減少些。可惜詩人如自已不下注脚，往往命意何在，很不容易道破，所以說詩的大家瞎猜，猜來猜去，添了許多寃枉的筆墨官司。

甲：詩人爲什麼不明白些，免得大家瞎猜呢？

乙：他寫詩原不是爲別人看的，至少不是爲一般人看的，你們不問和他同時或是生在他一千年後五百年後，瞎猜他的詩，干他底事？卽是他的詩是預備給某些人看的，也不希望他們一看就明白。我得再重複上面已經說過的一句話，越是好詩越是難懂。所以用假借，打譬喻，在你以爲不清楚，其實更富於暗示，更耐人尋味，是更有力量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的詩，讀一遍有一遍的滋味，讀十遍有十遍的滋味，決非一覽無餘的。要知道蘊藉的多寡往往是好詩壞詩的分別。

甲：不明白地說倒是一種修辭的技巧，請問除去修辭的理由還有別的理由麼？

乙：最重要的還有社會理由。在諷刺詩人尤其如此。西洋中世紀詩人挖苦女人，詛咒黑暗的現實世界，常用 Allegory。中國以往詩人論列時事的，講究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固然出語婉轉，易於發人深省，一半也由於不願明言以觸犯時禁罷。

甲：你上面說的都令我心服，令我承認，你不必再往這方面說。我臨時又想起一種難懂的晦澀例子，煩你指敎。杜甫的「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不是也成爲問題麼？

乙：我倒是聽見有人討論過這兩句。主要是文字構造的特殊，才引起誤解。詩和散文不同，爲了韻脚，爲了音節，爲了表達簡潔，詩人有時不得不省去散文上不應該省去的字辭，倒裝邏輯上不應該倒裝的句法，割裂習慣上不應該割裂的成語。這兩句犯了上面的不應該，用散文的眼光去講，自然問題隨之而來了。

甲：經你這一解釋，這問題算不成立。你上面似乎中西詩都提到一點，這就猛然敎我想起近來學讀西文詩的况味，也許我的西文差，我總然覺西文詩比中文詩更晦澀，更不容易領悟。

乙：限於時間，今天不能和你詳細討論這點。但不妨簡略地從廣義的用典一層說幾句。詩人有時引用古人的成事，自覺或不自覺地摹倣借用前人的名句，挑選能引起特殊情調或豐富聯想的字眼。這些都是有來歷的，而且因文字而異，因爲每一種文學的文學傳統不同。讀西文詩，能先熟悉西文學傳統，自然便利不少。因爲如果詩裏所引用的東西，不問是一件事，一個成句，或某種字眼，它的來歷早就爲你熟悉，當你去讀它時，你定覺得似曾相識，乍驚乍喜，使自己的想像生活有了新的證驗，新的收獲。若是臨時讀詩，臨時請人解釋或查注文，則你的準備不夠，你的心靈不能和從那首詩所新獲得經驗立卽適然融合起共鳴的作用——在這樣情形下，覺得它晦澀正是難以免避的。

甲：你又說得似乎頗有道理，眞的種種晦澀的原由都給你說得差不多了。

（下接十九頁）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六千元